

# 當代中國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UNIVERSITY  
OF MALAY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吉隆坡 马来西亚

Kuala Lumpur Malaysia

Vol.4 No.2 October 2017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

Volume 4, Number 2, October 2017

第4辑，第2期，2017年10月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社长  
黄子坚

主编  
潘碧丝

副主编  
贺艳青 林德顺

英文编辑  
张添财

行政主任  
林燕萍

编辑助理  
马瑛 朱锦芳

编辑委员会  
李冉 张森

国际编辑委员会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华东师范大学

庄国土  
厦门大学

吴小安  
北京大学

周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

聂珍钊  
华中师范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李锦兴  
马来亚大学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

饶兆斌  
马来亚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江柏炜  
台湾师范大学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单宝顺  
浙江理工大学

袁兴言  
金门大学

潘小慧  
辅仁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

*Chairman*

Danny Wong Tze Ken

*Editor*

Fan Pik Shy

*Deputy Editor*

He Yanqing    Ling Tek Soon

*English Editor*

Peter Chang Thiam Chai

*Administrative Officer*

Susie Ling Yieng Ping

*Editorial Assistants*

Ma Ying    Choo Kim Fang

*Editors*

Li Ran    Zhang Miao

*International Associate Editorial and  
Advisory Board*

---

Bo-Wei Chi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ih-Yu Shi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ui Zhiyuan  
*Tsinghua University*

Lee Kam Hing  
*University of Malaya*

Ngeow Chow Bing  
*University of Malaya*

Nie Zhenzhao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an Hsiao-Hu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han Baoshu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hen Zhihu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ing-Yen Yuan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Wang Haigu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 Xiao'an  
*Peking University*

Yang Xuedo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Zhuang Guotu  
*Xiamen University*

Zhou Jiansh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Volume 4, Number 2, October 2017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第4辑, 第2期, 2017年10月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in 2014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87,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z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sha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and claims for damages.

The contents of a published articl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author or authors and not that of the editors of the journal or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Cover Title: Dr. Lee Kean Yau

Typesetting: Wong Yee Chen

Print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University of Malaya, Lembah Pantai,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Please visit the CCS homepage at <http://ics.um.edu.my/?modul=CCS>

-----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s an academic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focusing on related issues about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nuscripts for consideration and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ent to: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 79567288

Fax: +(603) 79565114

E-mail: [ccs2014ics@gmail.com](mailto:ccs2014ics@gmail.com), [chinastudies@um.edu.my](mailto:chinastudies@um.edu.my)

#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

### Contents 目录

- 新中国文革时期科技知识分子在“革命”语境中的价值  
选择——基于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分子的考察 / 侯强 001  
Value choices made, under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Base on a study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Hou Qiang
- 冀东农村社区语言文化生活调查 / 姚春林 017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Cultural, and Life of the Farming  
Community in Jidong District / Yao Chunlin
- 东海争端对越中关系的影响 (2009-2014) 031  
/ 阮氏芳华、阮春强  
Impac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on Vietnam-China  
Relations Since 2009-2014 / Nguyen Thi Phuong Hoa,  
Nguyen Xuan Cuong
- 基于 Eviews 的中国大陆居民人均图书拥有  
量分析与预测 / 王争辉、廖冰凌 047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Based on Eviews on the Books Per Capita  
Possession Among the Chinese / Wang Zhenghui, Liao Ping Leng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

Contents 目录

“西进” 武侠电影的象、形、神——以李安的 《卧虎藏龙》为例 / 黄华、纪士欣	063
Discussing the Image, Shape and Charm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in “Westward Movement” - Illustrated by Ang Lee’s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 Huang Hua, Shixin Ji	

# 新中国文革时期科技知识分子在 “革命”语境中的价值选择 ——基于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分子的考察

侯强

**内容提要:** 在文革时期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激荡下, 整个中国实际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 以致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带来了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发生, 最终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文革这场反文化、反文明和反现代化的政治运动中, 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分子的困惑和选择同时表明了是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 他们的价值选择中实际包蕴了丰富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 文革时期; 中国科学院; 科技知识分子

**作者介绍:** 侯强(1966-), 男, 江苏句容人, 江苏理工学院教授,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邮箱: houqiang@jsut.edu.cn

**Title:** Value choices made, under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Base on a study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China descended into a state of utter chaos during the political upheaval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caused a decline in the intellectuals' social status, with many suffering tragic fates. More importantly and inevitably, this has hug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untry's scientific advancement. During this traumatic period of anti-cultural, anti-civilization and anti-modernization, the confusions faced and choices made by the intellectual provide a vital insight into the dire situation of that time. How the intellectuals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sets of values in fact contain profound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peculiarities of that period.

**Key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echnological Intellectual.

**Author:** Hou Qiang (1966-), born in Jiangsu. He is a Professor at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 gained his PhD in History, mainly focu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study. Email: <houqiang@jsut.edu.cn>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但不可否认，其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也留下了一些因极左政治的肆意横行带来的曲折教训。其中，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开始于 1966 年，结束于 1976 年，简称之为“文革”），就把“左”的错误推到了极端，给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国家以及领导下的人民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伤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谓。作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大革命”，其之所以被冠之以“文化”之名，是因为它最初是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初衷虽是出于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实际演化为破坏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是一场反文化、反文明和反现代化的政治运动。对此，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在文革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激荡下，整个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而科技和教育战线则被公认为是文革的“重灾区”，并逐渐形成了一套限制和排斥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制度。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成立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为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的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的综合研究发展中心。成立之初，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迅速凝聚了一批海内外优秀科学家，组建了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其在“向

科学进军”中发挥了先导和主力军的作用。但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作为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被视为一个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的单位，受到了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是时，包括上自副院长吴有训下到各普通研究员、副研究员，几乎是无人幸免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以致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笔者看来，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群体在现实处境中的价值选择，折射出了政治的动荡和理性的吊诡。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本，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和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透视新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机制，认识隐含于其中的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极左路线导致的民族灾难，从而更深刻地总结文革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教训。而对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的研究，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

中外学术界虽对文革历史多有研究（最早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术界，中国大陆有关文革的研究虽从未间断过，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对文革历史的研究还远远谈不上客观公正），但大多为文革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如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口述史、回忆录，带有个人传记性质的资料性文章，带有史料整理或史实考证性质的学术文章）以及从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综合视角进行的地方性个案研究、宏观性和专题性研究，对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群体的微观进行较为集中的专题研究成果还鲜见。据笔者所见，中国国内大陆学界涉及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群体专题研究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1989年，作为《当代中国丛书》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印出了预印本，叙述了中国科学院40年的发展史。1992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科技战线五十年》，武衡根据其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表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50年的科学技术工作。2009年，《中国科学院六十年》编辑部印出了《中国科学院六十年（1949-2009）》，以图为主叙述了中国科学院60年发展史。这些研究成果虽都对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群体问题有一定篇幅的阐释，但还都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的考察，对其在是时现实处境中的价值选择作些思考与分析，借以反思特定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信仰、价值和精神追求。

## 二、科技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党基本延续了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思想灌输和思想改造运动，采取了边改造、边使用的政策。但随着此后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和科学政治化的出现，科技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社会地位持续下降，及至文革期间达到了极致。是时，专业技术的重视被政治信仰的强调所取代，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极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科技知识分子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的党的干部受到赞扬，认为他们强于西方方式和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对比之下，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沾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受到诽谤”，<sup>1</sup>逐渐被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学术研究和独立思考的自由。

文革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认为科技领域的领导权已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要求全党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科学技术发展因之被纳入了“兴无灭资”的政治斗争轨道。然而，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并没有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而是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所谓的“大破大立”，这就使得各级科研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以致上演了一幕幕不堪回首的闹剧和悲剧。是时，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喧嚣声中，不仅知识的权威被否定，知识成为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且知识分子还被武断地划归到资产阶级范畴成为专政的对象，因之受到无端的排挤和打击，甚至被迫害致死。

文革作为新中国建立之初 17 年体制的产物，因其以简单的方式套用了以往革命年代的经验 and 做法，显得特别的狂暴，结果以更极端的“左”摧毁了 17 年体制，把阶级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具

---

1 [美] J.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97-398。

有使任何人无法回避的力量，凡是阻碍它发展的，都会被它无情地消灭。它发动的范围越广，形成的生存压力越大，社会动乱的程度就越深。”<sup>2</sup>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文革期间，因对一切技术工作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对待和分析，使得“左”的思潮迅速泛滥起来，不仅造成了打倒一切的局面，而且也带来了一切被打倒的局面。

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左”倾错误不断积蓄起来的巨大政治能量最终被猛烈地释放出来，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漩涡，造成了全国性的全面动乱，把意识形态领域左的错误对科技文化的危害推到了极端。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sup>3</sup>是时，科技领域陷于接受“再教育”和被改造政治漩涡中的专家、学者们，其中许多人因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倍受摧残，随之失去了从事科学研究所应有的环境和条件，以致在呼啸而来的政治运动的反复折腾中，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无尽的迷惘、惶惑、痛苦和绝望之中，只能在逆境中寻求发展。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驱动下，“文化大革命”热衷于用政治批判代替科学批判，粗暴地打击和鄙薄知识分子。是时，在科技领域内，文革把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的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以致“文化大革命”实际已演变成了大革文化的命和大革科学的命。在政治统摄一切的情境下，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规定，深入揭批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观点”，实现无产阶级占领科学阵地，竟荒唐地把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当作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并将爱因斯坦看作是“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此，全国上下吹响了无产阶级科学技术大革命的号角，相继成立了一系列的科学批判组织，编印了一大堆所谓科学批判材料，炮制了一系列对科学

2 朱乔森、李玲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3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390页。

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斗倒、批臭了一大批持不同学术见解的科技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科技战线因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的重要领域，许多科研机构或被撤消或被迫停止工作，整个科研系统的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除个别领域外，主要是军工方面），各项科学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而被砸烂、抛弃。是时，规划和管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因被攻击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班底”在1970年被撤消，转由国务院教科组代行职责。全国科技界权威性的群众性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历经大冲击和大动荡后，于1968年实行军管。翌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全部干部又被集体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以致其已名存实亡，及至1970年才部分恢复工作。

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其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文革前17年的教育作出了“两个估计”，认为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否定了建国以来17年党的教育工作。事实上，“两个估计”基本是1966年“五七指示”的文件化，因之具有统帅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冲击力。就其影响而言，“两个估计”已不单纯是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作出了错误的政治评价，其实际隐含着对新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不信任的基本评价，并已成为文革时期强加于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标志着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彻底丧失。

是时，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律被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技术第一”，使得原本就很狭小的对外科技交流渠道变得愈加狭小，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对外科技交流工作。在文革极端恶劣的政治气候下，极左势力肆意挥舞政治大棒，污蔑党内健康力量“反对宪法中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科研方向，就是要使科研回到‘三脱离’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就是要使科技战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sup>4</sup>这一切不仅

---

4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大批判组：《不许扭转社会主义科研方向》，《人民日报》，1976年6月20日。

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弄得整个科技界人心惶惶，使得中国科技的很多研究领域在此期间几乎陷于停顿，与世界先进国家整体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对此，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曾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sup>5</sup> 诚哉斯言。

### 三、中科院科技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党因长期为“左”的思想所困扰，实际已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认识的误区而又无以自拔。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言，因党和政府未能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对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信任和尊重，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知识分子的“改造”因之被推到了极端，以致变成了打击和迫害，最终导致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发生。是时，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推进中受尽种种折磨，在社会的夹缝里顽强地生存，经历了难以名状的不安与惶恐，灵与肉的折磨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时代印痕。这在科技知识分子扎堆的中国科学院有着较为典型的反映。

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与中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其无疑起着“火车头”的重要作用。有资料显示<sup>6</sup>，发展至1965年，中国科学院已拥有106个研究所，职工6.03万人（其中科研人员2.19万人），基本形成了学科齐全的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中心。但文革爆发伊始，中国科学院即屡遭冲击，其研究机构被大量削减和下放，到1973年仅剩下53个研究所（含双重领导的单位），职工3.52万人（其中科研人员1.35万人），学科残缺不全，研究力量薄弱，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院的整体性质和任务，以致众多科学研究工作被迫停顿或延缓，使得广大科技知识分子陷于空前的困顿之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5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6 国家统计局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20-21页。

文革爆发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反科学潜流得以恶性发展起来，不断猛烈地冲击着正常的科技秩序。是时，中国科学院被视为长期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控制，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单位而遭到攻击和诋毁，是一些人眼中应该被打碎和砸烂的机构。1966年7月30日，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发生，陈伯达和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召集科技界的万人大会，煽动中国科学院的群众揪斗“走资派”，中国科学院很快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历史地卷进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浪潮。1967年1月2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派闻风而动，成立“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院联夺”），夺取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权，迫使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委停止活动靠边站，正常的科学技术研究秩序因之被打乱。当日，中国科学院学部被宣布撤消学部的一切活动被迫停止，罪名是所谓学习苏联“修正主义”，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

随之而来的是，分布于中国各地各部门的绝大多数学部委员因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了批斗，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同年7月30日，“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实行解放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是时，虽然“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名义上是郭沫若，但实际上许多造反派头头挤进了科学院的最高领导层并把持了革委会机关各个部门的领导大权。及至1968年9月20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中央的命令进驻中国科学院，开始了工人和军人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特殊时期。

对于十年动乱的危害，有研究者指出：“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一种整肃，那么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包含了一种更为严重的反科学运动。”<sup>7</sup>事实也是如此。1968年3月，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便专门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自然科学理论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进行了无原则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肆意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把自然科学中的学术问题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将自然

---

7 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科学领域内的学术观点的分歧错误地看作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引发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矛盾的发生，以致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被极左政治无情地撕裂，一些日常科学研究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

是时，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被强加了许多罪名，成为专政的对象，横遭批判与迫害。有资料显示<sup>8</sup>，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科学院包括副院长吴有训在内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几乎无一幸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以1968年为例，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布所谓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以致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立案审查，遭到非法监禁、残酷折磨和刑讯逼供。该年，仅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名高研中就有131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的对象。在十年动乱中，中国科学院被抄家的有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有229名，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占全院职工总人数的0.38%。尤其严重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占分院职工总人数的比例高达0.68%。除上海分院外，长春分院的长春光机所、应化所以及在沈阳、大连、青岛、福州、武汉等地研究机构中的许多科技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刑讯逼供。这些不仅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而且也是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悲剧。

1969年，当“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斗、批、改”中的“改”字阶段时，在“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借口下，中国科学院各大区分院被撤销，大部分科研单位都被下放给了地方，许多科学技术研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缺乏设备及物资而陷于瘫痪。与之同时，大批“有问题”的干部和科技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学校”，不得不放弃原来所学的专业或从事的工作，接受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再教育，不仅白白耗费了他们的科学年华，而且造成了他们难以名状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sup>9</sup>以中国科学院湖北“五·七学校”为例，其“学员”人数常年大约有1000人，最高峰时曾达到2400人。由于其地处沼泽地带，位于湖北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高发区，先后有100多名“学员”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其中，有人还因没有彻底治愈后来导致肝硬化的发生，最

8 《中国科学院发展史》（预印本），北京：中国科学院，1989年，第73-74页。

9 广大干部和科技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学校”进行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的场所是强制性的，凡不服从单位安排的下放人员，一律扣发工资。



终离开了人世。<sup>10</sup> 1969年，在林彪签发“一号命令”后，中国科技大学奉命迁到安徽，在搬迁过程中不仅所有仪器设备全部报废，教职工也散失了三分之一，而且从此依靠院、所办学的优势不复存在。

文革时期，由于大批科研机构被拆散，不仅研究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而且国内外日常的学术交流也随之中断。是时，中国科学院各所与国外的联系不是极少就是完全停止。与之同时，国内不仅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期刊都停刊了，而且基础科学研究也基本被否定。加之，凡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要受到审查和批判，迫使众多科学家不得不中断了与海外的联系，以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实际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的状态之中。

文革爆发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经费也大为削减，科研物质保障条件趋于严重的恶化状态。据统计，1967年的经费只占1965年的16%。1970年以后经费虽略有增加，但1976年的经费仍比1965年减少1/3以上。<sup>11</sup> 是时，中国科学院的科研设备及实验室也遭受严重破坏。以北京植物园为例，其在被扣上了搞“花花草草”和“封、资、修”的罪名后，于1970年被撤消，变成了为中央首长供应副食品的基地，除了种菜外，还养鸡和猪。这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逻辑。在撤消后的搬运中，北京植物园多年搜集和培育的种子、标本以及拥有的图书资料损失严重。及至1972年，中国科学院虽然最终作出了恢复北京植物园的决定，但其被撤消所造成的损失是一时怎么也难以挽回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险恶情势下，周恩来、邓小平和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乱云飞渡仍从容”，他们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穿过政治风云的硝烟，关心和支持科学工作，采取把“焦点问题”模糊化的策略，在左躲右闪中尽可能与极左政治带来的负资产“切割”，极力寻找实现“革命”与建设的有效平衡点，努力减少和纠正文革的错误，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以尽力保护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减少政治运动对科技事业发展所造成的损失。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这些意图化危机为转机的纠“左”措施，虽仍然被极左政治所裹挟还有些笼统和含混，都还只

10 薛攀泉：《科苑前尘往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

11 张化：《中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顿》，《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能是做到“点到即止”，且大多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但其也犹如一大块抛向政治生活中沉浮的木板，尽可能使一些人拽着它上了岸。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正是在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关怀和保护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中的中青年研究人员通力合作，才得以在1974年完成了分辨率为1.8埃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分析。对于深处“漩涡”中的中国来说，这一研究成果可谓意义重大，因为其表明中国生物大分子的晶体结构分析工作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是时，在“科研为战备服务”的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军事科研实行了保护政策，使得中科院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并入军事科研体制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因而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在文革中，中科院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将卫星研制工作中的研究力量和设备交给了七机部，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 四、中科院科技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虽然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和偏差，但这些问题是局部的，偶有冲突也都在正常范围，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较为成功的。可以说，一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前，党和政府都比较重视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尤其是发挥科技知识分子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的作用，使他们蕴蓄已久的巨大能量得以释放了出来。但反右运动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广大知识分子陷入了痛苦、彷徨和不知所措之中。有研究指出：“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机构能够不受损害地逃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受害最深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sup>12</sup>。对此，面对政治与现实的矛盾和折磨，身陷“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的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分子感触尤深。<sup>13</sup>

12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1页。

13 早在“十二年规划”实施期间，党中央就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文革时期，伴随着波浪式政治运动的向前推进，党和政府把意识形态中“左”的错误和危害推到了极端，改变了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看法、态度与政策，开始错误地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灭顶之灾。由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了“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仅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人民政府的供给，而且在人生追求和精神追求方面也不得不唯政府是瞻。如此，面对文革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已变成“单位人”的知识分子是怎么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是时，对中科院科技知识分子来说，因为现实的政治压力过大，加之严密的单位制度的束缚，以致个人在社会中没有任何出路，所以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生存”已成为第一要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疲惫与茫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虽被极左政治逼进了死胡同，不得不屈从于所有强加于他们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但仍想尽办法以谋求社会的认同，成为文革时期苦难中的一群求生者。可以说，这既来自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也来自知识分子对现实处境无奈后的自救。

以杨嘉墀为例，1969年，作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主要研制和发射的科学家之一，他被“靠边站”到了自动化研究所去当厨子。半年后，他又被“站”到了北京假肢厂，去专为在礼花生产中因抢救国家财产而失去右臂和左手的王世芬研制假肢。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之下，为了生存的需要，他对于这些工作都用心地去做了。他做的饭，科学家们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研制的假肢不仅用在王世芬身上，还走出国门远销到了海外。在那样一个“物质暴力”和“心理暴力”双重控制下的“天翻地覆”时代，对于一个没有忘记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杨嘉墀的行为是身不由己，也是身不由己背后的抗争与妥协，呈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切片。可以说，这也是那个时代里对科学研究尚存有愿望的人的唯一选择。这一选择虽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无奈的一面，但反映更多的还是他们的生存困境、尴尬地位以及其内心的那份无力、无奈和迫不得已。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研究工作的失去，那种来自内在力量的召唤是无法抗拒的。

再以华罗庚为例，在现实政治语境的挤压之下，其虽被卷进了无法抵御的文革政治风暴中，弄得筋疲力竭，但他凭着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科学一直保持着圣徒般的敬重和殉道者的精神，并没有因之而放弃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责任，而是继续演绎着作为知识

分子的担当。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出于来自内心的渴望和梦想以及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信心、责任和热爱，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从胶水般的现实中奋力一跃，在自己的领域中竭尽所能，克服重重困难，力所能及地大力推广和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极端强调“阶级”和“阶级立场”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虽然从一开始就成为专政的对象，被卷进了一场无法抵御的政治风暴之中，如惊弓之鸟般始终未能从极其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但即便如此，中科院广大知识分子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极力找寻政治动荡年代的某种安顿，努力从自我价值的绝境中突围，并将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与自己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展现了人类珍贵的良知和智识品质。可以说，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生态下，推广和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是命运对华罗庚他们的抚慰，也是留给他们意外的谋生手段。

侯德榜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作为闻名世界的制碱专家的他被无情地停职靠边站了。但这并不能遏制住他对学术的无限渴望，当他获悉一位青年邻居在“轰轰烈烈”的气氛中竟然有学习英语的愿望时，便制订教学计划，为他单独授课。虽然只有一个学生，但他仍然一丝不苟。据说，一次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上门看他，他正在上课，竟也坚持上完课才与老朋友见面。及至1971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他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但当他得知中国要进口13套大型化工设备时，还是忧国忧民地勇敢地站出来，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进口一两套设备即可，或者引进一些关键设备和技术软件，其他可以复制，一下进口这么多不合适。因为在他看来，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事实上，这不仅是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突破自我的潜在动力和心理趋向，也是他们集体吟诵的心中的最高信念，并历史地成为他们性格乃至命运最重要的一部分。究其根源，其动力应该源自他们内心深处的强烈责任感。可以说，在那个反智潮流盛行的年代，中科院广大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代表一群人，而是代表一种力量，折射出的是他们坚守中的迷途和迷途中的坚守。

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新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科学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是一个有理想的群体。可以说，所有的磨难都敌不过他们对真理追求的执着。在极左政治语境下，中科院一些知识分子虽背负着现实的政治压力，“品尝”着不确定的命运甚至是

以悲苦为主调的滋味，以致如此错位地身陷历史迷阵之中，但他们不甘于在政治运动中消磨和损耗自己的生命，在困境与困惑中仍能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操守，在极端困难的科研条件下，以一颗无怨无悔的心追求科学真理，期待着冰消雪融那一天的到来，极尽所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时，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选择，不是少数，而是主流，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科学研究中，对科学的执着已然变成一种激励融入了他们的生命之中。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得失是微不足道的，相信科学的春天总会到来。这些在使我们感知到知识分子一颗颗热烈的心跳动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个时代里流淌着知识分子的一腔报国情。

令人不堪回首的是，伴随着文革政治风云的变幻，知识分子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无一不被裹进极左政治的历史漩涡中，普遍经历了跌宕起伏的非常命运。其中，中科院一些知识分子在避之不及的政治洪流中，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悲怆和绝望之中。他们中的“脆弱者”，虽竭力想把自己从滔滔洪水的存在境遇里拯救出来，但最终还是不幸被激流狂涛打懵、击倒，以致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维护自己被践踏得不能再践踏的尊严。以张宗燧为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红卫兵便莫名其妙地把他揪了出来，对其进行无休止的批斗，更令他伤心欲绝的是多年积累起来的研究笔记，也在抄家中被抄走而遗失。在遭受百般凌辱批斗后，一个曾极为自信的学者，就此堕入了极度的失望之中，最后竟于1969年底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痛楚地自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他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永远的不理解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逃避方式的选择，无疑饱蘸着他内心无比的悲愤，而这些悲愤则是他与时代发生“错位”的结果，至于后人是怎么也无法体察其彼时的精神苦闷和心理变动的。令人扼腕的是，张宗燧的选择并不是那个年代孤单的样本。对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有研究者指出，其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以致反右运动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的大量自杀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sup>14</sup>究其缘由是，一些遭受迫害折磨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这样一个让他

---

14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们绝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气氛中，虽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但终因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更多体味到的只能是内在的焦虑、紧张和矛盾以及深深的无奈和悲凉，除了选择自杀这种特殊的抗争外，已感到没有其他路可走。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是无法体味这些已冻结在历史苦难深处的他们内心所不为人知的压力和心境的。

有研究指出，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sup>15</sup>这一见解符合“问题复杂”的取向，无疑是有一定深度的。文革时期，对极左路线的怀疑深深地敲击着知识分子的内心，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的困惑和选择同时表明了是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他们的价值选择中实际包蕴了丰富的时代内涵。是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由于一味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科学，政治和行政对科学研究干预过深，对知识分子缺乏应保持的敬意，最终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就从深层制约了中国科技及其文化的发展，以致在科技运行机制和科技发展战略上弊患丛生、难以为继，造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自我断裂。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都是国家保持强大的支撑力量，并始终像基因一样传续。文革时期，在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中，知识分子的困境及其表现，既使我们看到了极左政治环境是如何扭曲人性，也使我们看到了人性在极左政治环境中的不时闪光。

##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大批判组：《不许扭转社会主义科研方向》，人民日报，1976年6月20号。

---

15 谢詠：《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4. 国家统计局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5. 谢泳：《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7. 薛攀皋：《科苑前尘往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8. 张化：〈中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9. 《中国科学院发展史》（预印本），北京：中国科学院，1989。
10. 朱乔森，李玲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11. J.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2.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 冀东农村社区语言文化生活调查

姚春林

**内容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结合访谈的方式, 调查中国河北省东部地区(简称冀东)一个农村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结果显示, 当地汉语方言是社区成员的母语和主要交际语, 普通话仅被部分被调查对象在特定交际场合使用。社区成员对两种语言变体的认同度都比较高, 但侧重点不同。对前者的认同主要体现在情感方面, 对后者的认同表现为工具性。电视节目和现代音乐是调查地的主要文化消费品, 这些产品几乎全部采用普通话为载体。研究结果显示, 普通话越来越被社区成员接受, 其社会功能正在逐渐扩大。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 当地传统语言类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其传承和发展令人担忧。基于以上事实, 本研究尝试提出了保护和发展当地传统语言文化的策略。

**关键词:** 冀东; 语言生活; 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 传统艺术

**作者简介:** 姚春林, 文学博士, 华北理工大学副教授, 天津城建大学副教授, 华北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2011.7-2015.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博士后(2013.3-2014.3);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邮箱: yao\_chunlin@126.com

**Title:**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Cultural, and Life of the Farming Community in Jidong District

**Abstract:**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re the main methodologies used for this study on the language, culture, and life of the farming community in the Jidong distric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ocal Han

致谢: 本研究是河北省文化艺术规划项目“冀东地区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现状及繁荣机制研究(HB16-YB021)”的研究成果。



dialect (LCD) is the community mother tongue an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Meanwhile the Standard Modern Chinese (SMC)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by some of the survey respondents. Community members are positive towards both dialects but with different reasons. Regarding the LCE, the emphasis is emotional, while with SMC, the reception is base on instrumental reasons. TV program and modern music are the researched community's main cultural consumption goods, and these are almost all performed in SMC. The result shows that SMC is becoming more accepted and its social function is continuing to expand. In such a linguistic reality, the space to keep local traditional dialect and folks arts alive is getting smaller, raising concern over its futur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Base on the above, this study will put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protect and develop the local dialect and the traditional folk arts.

**Keywords:** Jidong; language life; language use; language attitude; folk arts

**Author:** Yao Chunl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 candidate supervisor i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He got his Ph.D. degree 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11. He worked 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rom July 2011 to May 2015 and in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from March 2013 to March 2014, respectivel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cio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Linguistics. Email: <yao\_chunlin@126.com>

近些年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语言文化求同或趋同已成为语言文化生活的主旋律。弱势语言和文化的消亡速度正在加剧，甚至有走向濒危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历来重视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中国各级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制定了多项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法律和制度。在全世界语言文化求同或趋同的大环境下，这些法律和制度是否能够有效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这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以中国境内河北省东部地区（简称“冀东”）一个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调查社区成员的语言文化生活，考察社区内的语言文化活力，为研究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提供个案材料。

## 一、研究现状

中国语言学者大多从两方面关注国内的语言文化生活：民族语—汉语双语（或多语）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和汉语方言—普通话双言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

民族语—汉语双语（或多语）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是中国学者在语言生活方面关注最多的研究领域，相关成果最为丰富。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多年来他带领学生深入民族聚居区，调查民族语—汉语双语（或多语）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先后出版了12部《语言田野调查实录》，系统介绍语言生活研究的具体方法、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和民族地区语言生活的现状（王远新，2007；2009a；2009b；2010；2011；2012a；2012b；2013a；2013b；2014；2015；2017）。《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状况的实证研究》（邬美丽，2014）、《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周庆生，2015）等也是该领域较为重要的成果。

也有学者关注汉语方言—普通话双言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如王玲（2012）的《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薛才德（2009）的《上海市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俞玮奇（2012；2014）的《城市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年龄变化》和《上海城区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周薇（2011）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等。这些研究显示，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社区成为普通话—当地强势方言的双言社区（或汉语普通话—当地强势方言—其他汉语方言的多言社区）。在这些双言（或多言）社区中，汉语方言与普通话既存在竞争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语言规划部门面临的主要议题。

冀东方言属于汉语北方方言冀鲁官话的一个分支，是中国方言研究界最重视的方言之一。学界对这一方言的本体描写较为完备，当年丁声树和李荣两位先生主持的昌黎方言调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县一级的方言调查研究成果，具有突出的“样板”作用（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60）。遗憾的是，目前学界较少关注冀东地区的语言文化生活，未见相关成果问世。冀东地区位于京津冀经济发展带，属于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

长的重要一极。近些年来冀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当地的语言文化生活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这值得关注和探讨。

##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本研究是一项实证研究，秉承从“理论指导下的田野调查”到“第一手田野数据基础上的理论探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理念，客观展现冀东农村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探讨新时期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机制和策略。本研究的具体研究受试人群、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如下：

### （一）研究内容

本课题主要关注冀东农村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具体包括社区居民的语言习得、语言文字使用、语言文字态度、语言消费以及当地传统民间艺术现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各语言变体在调查地的习得和使用情况如何？哪种语言变体是调查地的主要交际语言？调查地的民众对不同语言文字变体的态度如何？

第二，调查地民众的语言文化生活呈现怎样的特征？

第三，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在调查地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 （二）研究对象

冀东地区地处平原，区域内人员流动较为频繁，语言文化较为接近。也就是说，冀东地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具有较大的同质性，这给本研究在选择调查点时提供了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综合考虑调查地的地理位置、人员组成、历史文化以及调查的可操作性等因素，本研究选择本文作者的出生地（唐山市滦南县）的一个传统农村社区为调查点。在调查点随机选择 18 岁以上的居民为调查对象，最终 45 位被调查对象完成了此次调研。在这些被调查对象中，男性 21 人（46.7%），女性 24 人（53.3%）；13 人（28.9%）的年龄在 35 岁或以下，15 人（33.3%）年龄在 36 岁（含）至 54 岁（含）之间，17 人（37.8%）年龄在 55 岁及以上；10 人（22.2%）仅有小学文化，21 人（46.7%）初中文化，9 人（20%）高中文

化, 5 人 (11.1%) 大学及以上文化。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具体如下。

**表 1 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单位: 人 / %)**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男	女	≤ 35	36-54	≥ 55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21	24	13	15	17	10	21	9	5
46.7	53.3	28.9	33.3	37.8	22.2	46.7	20	11.1

###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和访谈大纲收集数据, 统计相关数据后总结和分析冀东农村社区语言文化生活的特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包括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和调查问题两大部分。调查问题包含 47 道选择题, 从语言习得、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文字态度、文化产品消费、对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评价等方面全面考察被调查对象的语言生活。问卷采用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信息。所谓封闭式, 是指问卷给出选项, 调查员提问后被调查对象根据选项提供答案。所谓开放式是指被调查对象并非局限在给定的选项上选择观点, 如果他们认为选项不能表达 (或不能完全表达) 他们的观点,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发表意见; 这时候, 调查员在试卷所留的空白处真实记录这些观点。本研究中的访谈法主要用作对问卷调查法的补充。如果问卷调查过程中调查员认为被调查对象的观点特别有价值, 这时候调查团队会针对这一问题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访谈。本项研究中, 调查团队围绕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 8 人次访谈。

## 三、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

调查结果显示, 调查地的语言环境较为简单, 当地汉语方言为主要交际语, 普通话与汉语方言仅在某些领域并存。95.6% (43 人) 的被调查对象自报最先学会的是当地汉语方言, 2 人自报在 5 岁以前同时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 没有人在母语习得期仅学会普通话。访谈发现, 两位在母语习得期兼学会普通话的被调查对象年龄都在 20 岁以下, 都是学生, 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是教师。

目前,所有被调查对象都能流利听说当地汉语方言,所有人都能听懂普通话,18人(40%)能用普通话流利交谈。结合被调查对象的职业看其普通话能力,所有学生(7人)都能用普通话交流,80%(4人)的公务员能用普通话交流,其他能用普通话交流的被调查对象都有外出工作或学习的经历;结合被调查对象的年龄看普通话能力,35岁及以下的群体中76.9%(10人)能用普通话交流,36岁至54岁群体中6人(40%)能用普通话交流,55岁以上群体中11.8%(2人)能用普通话交流;结合性别看被调查对象普通话能力,18位能流利使用普通话交流的被调查对象中,10人为女性,8人为男性。综合以上分析发现,被调查对象的普通话能力呈现出较明显的代际差异,越是年轻群体,普通话能力越强;职业与被调查对象对普通话能力也有较强相关性,学生群体的普通话能力最强;而性别因素对被调查对象的普通话影响不明显。被调查对象学习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方式较为一致,他们自报通过家人影响学会当地汉语方言;通过学校学习学会普通话,另有2人自报兼受家人影响学会普通话。

被调查对象自报家庭内部交流时主要使用汉语方言,仅5人(11.1%)自报兼用普通话。这5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如与同乡聊天、去集贸市场、去当地医院、去政府机关办事等,被调查对象都自报使用当地汉语方言,7位(15.6%)被调查对象自报去政府机关做事时兼用汉语普通话。在工作单位,所有的学生和教师(9人)都自报使用普通话,4位公务员自报兼用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其他群体中仅2人自报兼用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所有被调查对象都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语言变体是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另有部分年轻被调查对象自报会英语,但由于没有使用环境,日常生活中从来不讲英语。

**表 2 语言使用 (单位: 人)**

	与家庭成员	与同乡	集贸市场	当地医院	政府机关	工作单位
当地方言	40	45	45	45	38	30
普通话	0	0	0	0	0	9
当地方言 和普通话	5	0	0	0	7	6

#### 四、语言态度及语言行为倾向

调查地是以汉语方言为主、方言与普通话并存的语言环境，被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存在很强的包容性。调查显示，3名被调查对象（6.7%）认为当地汉语方言很有用，19人（42.2%）认为汉语方言仅对部分人有用或在部分地区有用，23人（51.1%）认为当地汉语方言没有用；相应地，42名被调查对象（93.3%）认为普通话很有用，仅3人（6.7%）认为普通话仅对部分人有用或在部分地区有用，没有人认为普通话没有用。所有被调查对象都认为当地汉语方言听起来很亲切；仅4人（8.9%）认为普通话听起来很亲切，其他人认为普通话没有亲切感或不愿回答这一问题。6位被调查对象（13.3%）希望当地汉语方言在未来获得更大发展，17人（37.8%）希望当地汉语方言能够在本地获得发展，22人（48.9%）希望当地汉语方言在将来不再使用；43位被调查对象（95.6%）希望普通话在未来获得更大发展，2人（4.4%）希望普通话在部分地区或部分人群中发展。另外，部分被调查对象还谈到了对英语的看法，他们大多认为英语很有用，或至少对学生群体很有用，并希望英语能够在年轻人中得到很大发展。

**表3 被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单位：人 / %）**

	实用性评价			情感性评价			发展期待		
	很有用	部分有用	没有用	亲切	不亲切	不愿回答	更大发展	本地发展	不再使用
普通 话	42	3	0	4	35	6	43	2	0
	93.3%	6.7%	0	8.9%	77.8%	13.3%	95.6%	4.4%	0
当地 方言	3	19	23	45	0	0	6	17	22
	6.7%	42.2%	51.1%	100%	0	0	13.3%	37.8%	48.9%

日常生活中，被调查对象的语言消费行为主要包括看电视、听流行音乐、上网、读书看报和听传统戏曲。所有人都自报经常（每周至少一次，下同）看电视，23人（51.1%）希望看地方言的电视节目，但目前电视台没有提供这样的节目。14位（31.1%）被调查对象自报经常收听流行音乐，22人（48.9%）自报偶尔（每月至少一次，下同）听，9人（20%）几乎不听；15人（33.3%）经常

上网, 17人(37.8%)偶尔上网, 13人(28.9%)从不上网; 上网的被调查对象都是仅浏览汉文网站。9人(20%)自报经常读书看报, 21人(46.7%)偶尔读书看报, 15人(33.3%)从来不读书或看报。7人(15.6%)自报经常收听或收看传统戏曲, 9人(20%)偶尔收听或收看, 其他29人(64.4%)从来不收听或收看。对照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析, 7位自报经常收听或收看传统戏曲的被调查对象均55岁以上; 自报偶尔收听或收看的9人中, 6人55岁以上, 另3人接近55岁。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看电视、收听流行音乐、上网、读书看报和收听收看传统戏曲是调查地主要的文化消费行为, 其中看电视最受被调查对象欢迎, 但当地缺乏以当地汉语方言为媒介的电视节目。在这些消费行为中, 收听传统戏曲的被调查对象人数最少, 可以说是最不为被调查对象喜欢的文化消费方式。

教育领域中的语言服务是语言消费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而且教育是关乎民族发展的重要问题, 因此最受民众重视。为了解被调查对象对教育的看法, 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道题: “假如您家附近有不同语言教学类型的小学, 您希望后代接受哪种语言的教学(可多选)”。结果显示, 被调查对象的观点一致性较强, 所有被调查对象都希望下一代接受(包括兼接受)普通话教育, 29位(64.4%)被调查对象希望下一代同时接受英语教育, 没有人希望下一代接受当地汉语方言教育。被调查对象给出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普通话更有用, 能够帮助下一代找到理想的工作。同时, 选择接受英语教育的被调查对象也给出与此类似的解释, 认为接受英语教育能够更好地帮助下一代升学或就业。

由以上信息可以看出, 被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包容性较强, 他们认同当地汉语方言, 同时也认同普通话。比较来看, 被调查对象对汉语普通话的认同度更高一些。被调查对象在日常生活中以当地汉语方言为主要日常交际语, 消费的文化产品主要以普通话为载体。针对学校教育中的语言服务, 被调查对象持实用观, 希望能够将更有利于升学或就业的汉语和英语作为学校教育语言, 这种观点与中国其他地区民众的观点(姚春林、贾海霞, 2016)较为一致。

## 五、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现状

以上数据显示，调查地仅少部分年龄较大的被调查对象收听或收看传统戏曲。为了解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现状，调查问卷中设置了相关的专项调查题目，重点考察调查地民众对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认知情况、消费意愿以及其深层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13人（28.9%）不清楚调查地有哪些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20人（44.4%）不清楚当地是否有表演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机构或演出团体；29人（64.4%）从来没有收听或观看过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演出；6人（13.3%）自报能够表演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其中4人自报会演唱评剧，另外2人能够演唱评剧和大鼓。

被调查对象对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态度呈现出较大差异性。19人（42.2%）认为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好听，23人（51.1%）认为不好听，3人（6.7%）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21人（46.7%）希望未来能有机会欣赏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20人（44.4%）没有这样的意愿，4人（8.9%）不愿回答这一问题。23人（51.1%）认同“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是民族的瑰宝，应该继续发扬光大”，5人（11.1%）认为“当地的民间艺术仅需要在当地发展就足够了”，14人（31.1%）认为“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不适合现代生活，应该被淘汰”，3人（6.7%）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结合被调查对象的年龄看其对待传统民间艺术的态度，二者呈现一定的相关性。总体来说，年长的被调查对象大多喜欢传统民间艺术，希望传统民间艺术获得进一步发展；而年轻的被调查对象大多不了解、不喜欢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对这些艺术持消极态度。

访谈中，部分被调查对象向调查员详细阐述了他们对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看法。一位被调查对象（女，19岁，初中文化，农民）表示，“我不喜欢评剧、大鼓等民间艺术，更不想欣赏这些艺术，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这些艺术节奏缓慢，不适合当下快节奏的生活；第二，演唱时使用的是方言，比较难懂，听起来也不好听；第三，节目内容与现代生活关系不大，听完以后很难明白究竟唱了什么。”另一位被调查对象（女，67岁，小学文化，农民）表达了不同看法，“我喜欢评剧、大鼓、皮影等艺术。小时



候就是听这些长大的，现在听到这些演出感觉特别亲切。”当被问到是否喜欢现代音乐时，这位被调查对象表示，她不喜欢现在的流行音乐，认为这些音乐太吵太闹，不好听。另外，流行音乐的内容充满了爱情字眼，她个人认为这些不适合在公开场合演唱，从而更加不喜欢现代流行音乐。由以上可以看出，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人生态度，导致对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和现代流行艺术产生不同的看法。

## 六、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调查地是一个以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为交际语的多言社区。当地汉语方言是社区成员的母语和主要交际语，普通话仅是部分被调查对象在特定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变体。社区成员对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认同度都比较高，但二者侧重不同。对当地汉语方言的认同主要体现在情感方面，认为当地汉语方言好听、亲切；对普通话的认同表现为工具性，认为普通话更有用、更有助于找到理想的工作。被调查对象的语言文化行为更多地表现出实用性，他们大多希望后代接受普通话教育，甚至同时接受英语教育，认为这样的教育形式能够帮助学生就业。电视节目和流行音乐是调查地主要的文化消费品，这些消费品几乎全部采用普通话为载体。由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虽然当地汉语方言是调查地的主要交际语，但普通话越来越被社区成员接受，其社会功能正在逐渐扩大。目前在教育领域，普通话已经完全代替了当地汉语方言，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随着教育普及，也许有一天，普通话会取代当地汉语方言成为社区唯一交际语。

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仅 15.6% 的被调查对象自报经常收听或收看传统戏曲，仅 13.3% 的被调查对象自报能够表演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并且这些被调查对象多为中老年被调查对象。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令人担忧。

被调查对象在访谈中给出的观点很好地解释年轻人不喜欢当地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原因。传统民间艺术多以历史事件为题材，反映创作时期的社会面貌，与当代社会有非常大的差异。传统民间艺术表现的内容多为当代人不熟悉或不喜欢的内容，这是传统民间

艺术在当代社会活力降低的原因之一，而汉语方言的社会功能弱化也是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活力降低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国已经立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虽然语言管理机构多次明确表态，希望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保护汉语方言的多样性，但多种语言变体并存会增大语言使用者学习多种语言变体的成本。为节约时间成本和个人精力，大部分民众将放弃学习或使用汉语方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汉语方言为载体的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活力必将受到削弱。另外，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形成于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以前，多以当时的汉语方言为载体，而现在人们使用的方言吸收了很多普通话词汇，与传统民间艺术使用的语言载体有很大不同。这就造成当代人，尤其当代年轻人，很难明白甚至很难听懂传统民间艺术使用的语言，更不会喜欢传统民间艺术。

方言和传统民间艺术（包括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斗争中形成了民族瑰宝，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写照。为了保持与先辈的联系，找到生活中的“自我”，全社会都应该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民间艺术。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的活力正在逐渐濒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为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并传承和发展语言类传统民间艺术，相关部门可参考和借鉴以下措施。第一，赋予每个语言变体应有的社会地位，增大汉语方言的社会功能。第二，研究和发展传统民间艺术，创作出更多贴近现代生活、更被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进一步丰富传统民间艺术的内涵和曲目。第三，设立专项资金，培养和训练传统民间艺术继承人，并定期为当地民众免费带去各种传统民间艺术演出，让当地民众了解传统民间艺术，进而喜欢传统民间艺术。第四，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相关课程，将方言和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让儿童在学校学习当地方言，增强语言使用者对方言和传统民间艺术的认同，也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和喜欢当地方言的传统民间艺术。诚然，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和发扬传统民间艺术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 参考文献

1.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2. 王玲：〈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1期。
3.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a。
5.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b。
6.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四）》，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7.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五）》，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8.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六）》，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a。
9.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b。
10.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八）》，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a。
11.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九）》，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b。
12.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13.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1）》，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
14. 王远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2）》，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
15. 郭美丽：〈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状况的实证研究〉，2014。
16. 薛才德：〈上海市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第2期。
17. 姚春林、贾海霞：〈从语言功能看语言文化保护的复杂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8. 俞玮奇：〈城市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年龄变化〉，《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3期。

19. 俞玮奇：〈上海城区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4期。
20. 周庆生：〈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2015。
21. 周薇：〈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 东海争端对越中关系的影响 (2009-2014)

阮氏芳华、阮春强

**内容摘要:** 从2009年至2014年越中之间的东海争端<sup>1</sup>演变复杂, 使得本区域被视为容易发生冲突的国际热点。因为导致区域紧张的事件日益增加、东海争端影响到越中关系的范围相比之前也有着巨大不同, 使得越中关系进入“政治冷”状态, 双方东海纠纷的矛盾程度和紧张局势不断增加、事件紧张程度不断升级, 东海争端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日益严重。本文以越南学者的视野在越南与中国的考察角度下对于越中之间从2009年到2014年阶段东海争端进行评价与分析。这是由越南国家基础研究基金(NAFOSTED)支持V1.2-2013.06课题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 越中关系; 东海争端

**作者简介:** 阮氏芳华(1977-),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博士, 研究方向: 越中关系, 中国对外政策, 邮箱: qhphuong hoa@yahoo.com; 阮春强(1973-),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博士, 研究方向: 越中关系, 中国政治。

**Title:** Impac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on Vietnam-China Relations Since 2009-2014

**Abstract:** From 2009 until now, the South China Seas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has worsen, complicating this international hot spot with increased risks of conflict. As a consequence, thi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ino-Vietnam relationship, causing them to be trapped in a 'cold politics' state.

---

1 这海立于越南的东边, 所以越南人称为东海。东海英文名称是: South China Sea, 中文称为南海。本文章统一使用东海名称。

Indeed both countries have adopted hostile postur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s disputes, undermining any efforts to improve crisi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for the period between 2009-2014. This report is based on the result of surveys conduct by Vietnamese scholars.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Vietnam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NAFOSTED) under grant number V1.2-2013.06.”

**Key words:** Sino-Vietnam relati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uthors:** Dr. Nguyen Thi Phuong Hoa (1977-),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Research field: Vietnam-Sino relation. Email: <qhphuonghoa@yahoo.com>; Dr. Nguyen Xuan Cuong (1973-),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Research field: Chinese politics, Vietnam-China relation.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之后，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东海争端进入了日益复杂的新发展阶段。2009年之后发生了诸多关于东海问题导致越中关系紧张的事件。例如：2010年，越南与诸国在东盟地区论坛（ARF）提出东海问题；2011年，中国渔政船剪断越南石油勘探船电缆；2012年，越南国会通过《海洋法》，中国公布设立三沙市；特别的是，中国从2013年9月起，在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2014年，中国使用海洋981石油钻井平台放在越南的经济特区与大陆架内等一系列活动，使得东海争端进入长期升温状态。有中国学者认为：“为了大规模工程顺利地进行，需要使用石油钻井平台来隐瞒主要目的”，海洋981石油钻井平台“已经对长沙岛礁大规模吸沙活动发挥了作用”<sup>2</sup>。至2015年6月中国已扩大及改造2900英亩（1170公顷）的岛礁。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数据显示，在不到2年之内的时间里，中国在长沙岛礁改造面积比有关国家40年的改造面积要高出了17倍之多，占长沙岛礁的95%<sup>3</sup>。

2 薛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新形势〉，在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

3 WSJ: Pentagon Says China has stepped up land reclamation in South China

尽管越南与中国领导认为东海问题不是全部越中关系，但是东海的事件对越中关系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影响到两国人民对执政党和国家形象的感情。越中关系中的东海争端事件从 2009 年至 2014 年出现频率日益增加、日益严重，影响的范围与之前有所不同。上面所提出的有关东海事件表明两国的纠纷程度日益增加，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刻。东海争端不但使得两国通过公开外交途径表示反对，还影响到其他合作领域，影响到两国人民的感情。对越南来说，东海问题不仅仅限制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处于国家重要的内部问题（对越南是最重要问题），不但是主权、领土完整的敏感问题还有民族感情问题。正因如此，东海问题的影响力越大，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阻碍越大、对国内稳定、共产党执政的风险越高。

本文以越南学者的视野，根据公开发表文章、资料、专家采访、北部边界省、胡志明市、平阳省的实际考察相结合、与之前其他阶段比较对越中关系在东海争端（2009-2014）的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

## 1、东海争端使得越中关系进入“政治冷”状态

由于发生东海紧张的事件，中国学者认为从 2009 年至 2014 年两国关系进入“政治冷、经济热”状态，“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之间在中国对东海政策主动调整时出现“政治冷、经济热”状态”<sup>4</sup>。这意味着经贸合作还维持增长趋势，中国还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经济热）但与前一段时间有所不同的是从 2009-2014 东海争端已经直接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政治冷）。

其实，2009 年之前，东海争端事件已引起外交激烈纠纷，有

---

Sea, (20 August,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pentagon-says-china-has-stepped-up-land-reclamation-in-south-china-sea-1440120837>;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p.72.

4 薛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新形势〉，在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19 页。



时甚至已经发生了实际冲突，但是还没有导致像 2009 年之后的“政治冷”状态。万安北 21 号合同事件已使得越中关系于 1992-1995 阶段进入紧张状况，但是两国高层领导连续在 1992、1993、1994、1995 年保持互访。1997 年中国把“勘探 03 号”石油钻井设于东海，该事件使得两国关系再次进入紧张趋势，但当年越南领导人还是对华进行了正式访问。2009 年之后，情况明显改变了。

“政治冷”表现于传统的高层互访日益减少，特别是到 2011 年起两国高层互访名称“正式友好访问”改称为“正式访问”或“国事访问”。2009-2014 年期间，虽然两国间高层互访还继续保持下去，但是跟之前相比，这段时间双方高层互访最少（在六年期间只有 3 次互访），其中在 2009、2010、2012、2014，这 4 年间双方未有高层领导正式互访，而只在国际会议平台见面、进行会谈。在中共十七大期间（2007-2012），未有中国高层领导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导致该阶段缺乏高层领导互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国受东海争端的紧张、复杂的影响，后来双方进行高层领导互访的目的是把两国关系恢复到正常轨道并稳定下来。

两国高级领导缺乏正式互访期间正是东海争端发生复杂、恶化期间。2009 年，在中国日益施压的强烈背景下，越南增加了保卫主权活动如黄沙县县长任命<sup>5</sup>，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越南与马来西亚的 200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反过来，中国驻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则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反对公函及九段线地图。值得关注的是，2009 年在黄沙群岛地区中国实施了连续几起抓捕、打伤越南渔民和渔船事件，甚至越南渔民进入本地区逃避台风也被中国抓捕<sup>6</sup>。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对越南渔民实施的反人道行为导致越南人民对中国公民的消极反应，以此直接影响到越中关系。

2010 年因越南在第 17 届亚洲区域论坛（ARF）上主动提出东

---

5 2009 年 5 月 24 日，岘港市决定任命岘港内政事务局局长邓公语为黄沙岛人民委员会主席。

6 2009 年 6 月 21 日，中国巡逻队逮捕了三艘越南渔船，其中包括 37 名越南渔民正在越南的西沙群岛海域实施正常捕鱼，要求支付赎金 30,000 美元。8 月 1 日，另外 13 名越南渔民在黄沙群岛海域捕鱼被中国人逮捕。2009 年 9 月 28 日，越南渔民在黄沙避免风暴，也遭到中国士兵的追击和虐待。12 月 7 日至 8 日，3 艘渔船和 43 名越南渔民在西沙群岛海域执业时被中国职能力量扣留了。

海问题，而参与论坛的 27 个国家当中大多数成员在会议上表示关注东海和平稳定问题，但中方认为领土争端不符合一个区域会议讨论的话题，使得两国关系继续进入紧张趋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本次论坛上提出：“美国在东海的航行自由、自由出入亚洲海域并尊重国际法问题事关国家利益”，“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主权声索国”<sup>7</sup>。这一宣布使得中国外长杨洁篪第二天把它称为“图谋行为”。本次论坛使得中国在一个国际平台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国媒体一律对越南和美国讽刺和批判，认为越南和美国“串通”把东海问题进行“国际化”，批评东盟国家与美国和区外国家串通在多方平台反对中国东海政策。该事件使得越中外交关系陷入紧张局势。

2011 年，中国执法力量船对越南在经济特区的石油勘探船剪断电缆的事件使得两国关系陷入正常化以来的最紧张状态。越方评价为两国关系从正常化以来陷入最不良的时期、信任明显下降（越共中央对外部代表的表述，发表于中国研究所，2011 年 11 月 14 日）。正因如此，阮富仲总书记对中国的访问是以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为目标，但访问称“正式访问”而不是像以前的“正式友好访问”，这意味着越中关系具有巨大的变化。

2012 年，越南国会通过海洋法事件以及中国宣布设立三沙市，再次使得越中关系陷入动摇状态。2011 年，中国趁着阮富仲总书记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中方提醒越方不应该通过海洋法，因为中方认为跟中国的两个岛屿有关系。在 2011、2012 年的事件后，越中关系开始有了改善。其表现为，2013 年 3 月越中两国总书记首次使用热线电话互相问候，以及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中国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越南。但是，越中关系的稳定却因海洋钻井平台 981 事件而再一次陷入僵局，该事件的严重性已超过了 2011 年的平明 02 事件，让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局势，紧张时间更为长久。

两国高级别领导在海上问题达到共识，双方都强调重视处理东海问题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海上问题是越中关系的一部分，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越中关系良好发展的大局以及不让东海问题影响

---

7 Huỳnh Hoa: Ai làm dậy sóng biển Đông? Who rose up South China Sea waves? 2010, <http://www.thesaigontimes.vn/Home/diendan/sotay/39002/>.

到两党、两国关系和东海的和平稳定。但是，实际情况显示，共识未有约束力。越南前总理阮晋勇曾经指出：“中国正在所做的远远区别于中国所说的”<sup>8</sup>。再加上南海问题跟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有关系，所以争议程度会更为激烈。因此，“政治冷”既体现与对方激烈斗争，又体现得到国内人民接受反应，避免“火上浇油”情况，引起国内人民激烈的反对。

## 2、东海纠纷的矛盾程度和紧张局势提高、 事件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

对于 2011 年 5 月发生的事件，越南政府通过诸多途径和方式表示反对中方的行动。事件发生期间，中国和越南几乎陷入彼此舆论对抗、使用外交形式来反对对方，比如提交抗议书。越南在提交的抗议书中说，中国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裁判权，把无争端区域变为具有争端区域，中国把九段线变为了现实。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认为，越南航船在中国海域进行非法活动，严重损害中国东海权益和管辖权，中国船剪断越南电缆行为属于监督行为和正常执法行为。当时，为了抗议中国，越南首次召开国际媒体会表示反对中方行为和发言。

在越南通过《海洋法》时，中国通过多种途径如召见越南驻华大使提交抗议书、中国人大对外委员会向越南国会对外委员会提出抗议表示要越南立即修改海洋法。中方使用的反对语气非常强硬，认为越南通过《海洋法》的行为是“错误”、“非法与无效”的，要求越方立即停止并修改所有的错误，不做任何危害到越中关系和东海和平稳定的事情<sup>9</sup>。

2014 年的海洋 981 事件，越南在 2 个月之内同时展开各方面活动向中国进行抗议（实际平台、外交平台、国内与国外宣传平台等）。越南高层领导即总理、国家主席在国内和国外平台公开对

---

8 Vnexpress: Thủ tướng: 'Không đánh đổi chủ quyền lấy hữu nghị viên vông', 2014, <https://vnexpress.net/tin-tuc/the-gioi/thu-tuong-khong-danh-doi-chu-quyen-lay-huu-nghi-vien-vong-2994075.html>

9 新华网: China opposes Vietnamese maritime law over sovereignty claim, 2012.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2-06/21/c\\_1316686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2-06/21/c_131668632.htm) 2012-06-21.

中国的行为表示反对。越南在诸多国际平台提出 981 石油钻井平台事件。东盟高级领导会议在缅甸举行，越南总理阮晋勇认为中国这是“特别严重违法”，“非常危险的行为”。越南国防部部长冯光青在第 13 届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在缅甸举行的第 27 届东盟与美国对话、第 24 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家成员会议等国际会议中提出反对中国这一行为。越南共产党、国会的重要会议都直接对东海问题进行讨论。2014 年 5 月 14 日，越南共产党第 9 次全体会议里发布通告提出海洋 981 事件，公告肯定保卫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sup>10</sup>。越南国会 2014 年 5 月 21 日颁布公告，表示对于越南共产党与国家的主张表示一致。2014 年 6 月举行的政府会议也对东海情况与对应进行了讨论，阮晋勇总理再次强硬反对中国的行为。在国际舆论方面，越南在与中国交换反对意见未有结果时，越南多次向联合国提交反对中国的公函（2014 年 5 月 20 日；2014 年 6 月 5 日），向潘基文秘书长建议使用越南外交部反对中国公函作为联合国大会第 68 届正式资料（2014 年 5 月 31 日；2014 年 6 月 6 日）。

反之，中方召见了越南驻华大使并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胡春山通电话，中国外交部发给越南外交部公函重复中国的“严肃立场”并反对越南的“无理要求”。2014 年 6 月 9 日驻联合国的中国副大使王明向潘基文秘书长提交中国立场并要求潘基文秘书长把反对资料提交给大会的 193 个国家。

2014 年 5 月至 8 月，受石油勘探钻井平台事件的影响，两国两党的各级代表团未有互访，从 8 月起逐渐回复但是比之前几年明显减少了很多。这是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次出现的新情况。该情况反映了越中外交关系明显受东海争端的影响。

综上所述，东海问题跟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关系的。因此，两国党和政府都受到国内人民的重大压力，所有政策、表态都要符合于国内人民的愿望。对于中方，人民要求党和政府体现国家实力与强硬态度。对于越方，人民要求党和政府不能屈服于中国的威胁。这是两国因东海问题导致关系进入紧张形态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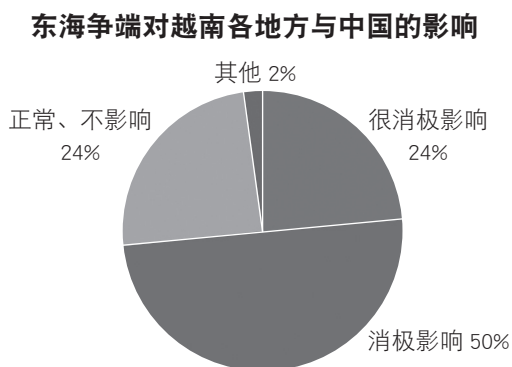
---

10 Carlyle Thayer: Not Too Hot, Not Too Cold: A Vietnamese Perspective on China-US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China-US Relat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Wellington, New Zealand, 8-9 October, p.13. Available at: [http://viet-studies.info/kinhte/Thayer\\_NotTooHotTooCold.pdf](http://viet-studies.info/kinhte/Thayer_NotTooHotTooCold.pdf).

面对中国在东海增加行动，越南党和政府受国内人民舆论的压力日益增高。敌对分子利用领土、主权问题对越南共产党攻击，提出党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歪曲论点，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使人民对党失去信心。除此之外，公民社会和互联网的信息渠道迅速地发展（实际上发生在越南的游行事件采取了脸书/面子书来联系和召集群众）。从此，政府面临信息透明化和适当处理信息的挑战。民族主义升高同时，越南共产党和政府在处理东海争端的压力更大，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视为软弱、让步，将被利用于攻击党和政府，造成其他社会不良现象。981石油钻井事件发生时，在越南的一些地方爆发了游行、群众攻击中国工厂，甚至其他国家的工厂，使得越南政府要承担补偿外资企业的责任，严重影响到越南的投资环境。因此，东海问题不只跟国外有关而且还是国内的重要问题。

### 3、东海争端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日益严重

东海争端对于越中关系来说具有消极的影响。据2015年9月的考察结果<sup>11</sup>表明，50%参加考察的人肯定东海争端影响到越南与中国各地方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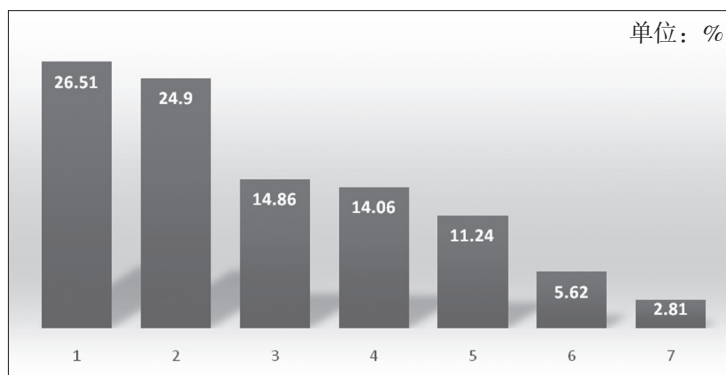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结果

11 2015年，我们在越南北方的高平、谅山、老街等一些边界省和南方的胡志明市、平阳省进行实际考察并听取各省的有关报告，对200个人发出调查卷，包括各省的公务员、在中国企业的工人和当地人。

以往东海争端主要影响到外交关系、经贸关系，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不大，即使有影响也是很短暂的，但是石油钻井事件后东海争端不但影响到了外交和经贸关系，也对文化和旅游业等产生极大的影响。据我们在越南北部边界省份、胡志明市、平阳省的关于石油钻井平台事件对各方关系的影响的考察结果也有同样的结果。

海洋石油 981 钻井平台事件对各地方的影响力



1、向中国出口下降；2、地方人民销售中国货下降；3、货物停留时间长；4、口岸出入境人数减少；5、劳动就业下降；6、在各地方的中国投资下降；7、其他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结果

对于经贸关系，尽管东海争端未影响到越中投资金额，但从 2009 年起，特别是在 2014 年之后，经贸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与东海争端凝聚，给越南人民造成了消极心理、对中国的警惕心理日益增加，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未来合作。

东海问题升温时，2009 年越南媒体纷纷反映在越中发展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sup>12</sup>，即从中国顺差问题、中国企业在越南的重要领域、工程等问题。这些问题，在 981 事件之后达到了最高峰值，即有人提出“脱华”建议。越中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也被高度分析与评价，提出意见更加强烈。越南舆论从来未关注中国顺差问题，也

12 诸多文章纷纷刊登如：“向中国顺差贸易的噩梦”（下载：<http://vef.vn/2010-12-27-choang-ngop-voi-nhap-sieu-tu-trung-quoc>）；“中国贸易顺差的无理”；“中国人抓住越南的重点工程”；童士原中将发表关于向国外出租土地的警惕”等。

未对越南贸易逆差给越南经济造成影响的问题仔细分析。但 981 事件发生之后，越南学者提出越南经济依赖于中国经济过高、向中国进口设备的质量问题等等。981 事件发生后，诸多研讨会纷纷讨论“脱华”、市场多样化等问题以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在官方韩国和欧洲国家时，越南领导都呼吁各国给越南货物提供更多便利条件，让越南货物可以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以逐渐减少越南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这意味着 981 事件和东海争端对越中经贸关系产生了直接和长期的影响。

石油钻井平台事件也对越中进出口行业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中国未收回钻井平台时，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越南的有关部门曾提出中国会关闭口岸、隔断与越南的经贸来往的假设，提醒越南需要做好准备。2014 年 5 月、6 月越南货物向中国出口放缓。我们的考察结果显示 981 事件对越南地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中国在东海的行为导致投资受到了强烈的影响。石油钻井事件造成工业园区的工人游行，情况恶化后，中国召回工人，警告中国公民不要到越南，并暂时停止合作计划。越南平阳省、河静省的游行事件发生后，诸多中国企业业主、专家、工人回国。一些施工工人和专家也因害怕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而不敢到越南。

中国执行“战争危机政策”对越中关系的稳定和投资环境的影响深远。中国企业对继续在越南进行投资感到忧虑，大大影响了中国在越南的未来投资趋势。中国媒体刊登平阳省游行事件后，中国大陆企业、台湾企业、香港企业纷纷向柬埔寨市场进行考察，考虑离开越南市场，把投资资源转到柬埔寨；有的企业甚至直接关闭工厂如专门制造摩托车的力帆企业。

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受东海争端事件的影响更加直接、迅速和深刻。从 2008-2013 年期间，双方互访暂时停止，但是后来迅速地恢复。中国是越南主要的游客市场，占国际游客市场的 25%。2013 年，越南接待 190 万中国游客人次，占到越南的国际游客的四分之一<sup>13</sup>。

但是，2014 年的 981 事件对两国旅游合作的影响深刻。从 2014 年 5 月 18 日起，中国向到越南的游客发出安全提示，“暂时

---

13 Baomoi: Khách Trung Quốc đến Việt Nam tăng mạnh, 2014, <https://baomoi.com/khach-trung-quoc-den-viet-nam-tang-manh/c/13668179.epi>

禁止来往”并“暂时停止一些双方交换计划”<sup>14</sup>。中国国家旅游局向中国旅行社提示尽快把游客接回国。2014年5月和6月期间，大多数的中游团都被取消。越南陆地口岸芒街、友谊、老街等原来每天接待大量中国游客，但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游客入境。与此同时，越南方面也取消到中国的旅游团表示对中国的反对。

游客量下降直接影响到专门给中国游客提供服务的行业，以及交通运输、贸易、投资、农业生产和其它行业，严重影响到了越南的旅游税收。

有一个现象明确反映出东海争端的消极影响，就是中国人学越南语和到中国留学的越南人数逐年下降。我们在2015年3月与中国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国际合作处的交流中得知到该学院学习越南语的学生明显下降。向来越语系招生的成绩分数在各系之中要求最高，但目前却是要求成绩分数最低的，其他东盟国家的语言成了中国学生的优先选择，而到越南留学和交流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在下降。

####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2007-2015 年 出国留学、交流的学生统计

时间	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数量 (人)	在越南留学的学生数量 (人)	在越南留学占国外留学的比率 (%)
2007	571	310	54.29
2008	615	288	46.83
2009	702	351	50.00
2010	674	363	53.86
2011	167	49	29.34
2012	406	178	43.84
2013	469	153	32.62
2014	450	149	33.11
2015	261	47	18.01

资料来源：2015年4月，根据中国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国际合作部门提供数据

14 新华网：外交部：中方从即日起暂停中越部分双边交往计划，2014。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8/c\\_111074107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8/c_1110741073.htm).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之前到越南留学的学生占出国留学学生的50%，但从2011年至今却一直少于50%。学院的工作人员指出要原因是使用越南语的就业范围明显缩小，并且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就是东海争端影响了中国人对越南的印象。另一方面，据越南驻南宁领事馆的总领事，越南到中国留学的人数也明显下降。可见，东海争端对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此外，东海争端对两国的社会和人民感情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该问题引起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形象具有消极的评价和看法，特别是越南人民，该问题也直接影响到两国领导所提出建立互相信任的目标。

越南南北统一以来，人民未有游行现象。但是，中国在东海的行为成为越南最近几年人民游行现象的理由。中国剪断平明02船的电缆事件造成从2011年6月至8月连续10周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的游行风潮。越南人民欢呼“反对中国攻击行为”，“中国禁止侵略越东海岛”，“黄沙和长沙是属于越南的”。石油钻井事件不但引起越南国内的人民游行，还引发世界各国的越南人民上街游行抗议。开始的时候，游行主要在河内和胡志明市进行，接着是同奈省、平阳省和胡志明市工业区的2万工人的游行（2014年5月12、13、14日），河静省琪英县泳映经济区的上千工人游行（2014年5月14日）。反对中国、歧视中国的心理日益高涨。在国外，在美国洛杉矶、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日本东京、捷克布拉格、台北等地的越南人和越侨也表示反对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歧视心里也越来越强。中国网络纷纷刊登文章评论，并对中国主权提出观点和辩论。中国人民呼吁中国政府要对越南表示强硬态度。显然，东海争端对越中关系产生了长期、深远、难以计算的影响。

有关东海争端事件还引起其他的消极影响，比如和越南的网络骇客相互攻击。发生在2011年5月和2014年5月的东海事件，中国网络和带有gov.cn中国政府网站被认为遭越南骇客攻击并发出黄沙和长沙是属于越南主权的声明。反之，2011年6月8日，诸多越南网站也纷纷被攻击，并发出中文声明、展示中国国旗和播放中国国歌。据越南应急救援电脑中心（NVNCERT）统计，2014年5月8日至11日，大约有220家越南网站被认为遭中国网络骇客

攻击，其中包括越南国家石油集团网站和黄沙资料中心管制网。在中国方面，也有十几家中国企业、组织的网站被认为遭到越南网络骇客的攻击。

中国第一次把石油钻井设在东海有争端的经济特区和大陆架内，做法让越南人不满和对两国的良好关系产生怀疑。究竟越中关系如何？中国如何看待越中关系的重要性？越中关系在两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意见认为，中国依靠两国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对越南采取强硬的行动。越南社会舆论担心两国会发生战争。正因如此，所有跟中国有关的问题都容易成为敏感问题，容易引起反对心理。

## 结论

越中关系带着历史问题，又有不对称的性质。越南在建国与保卫国家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封建朝代的战争、1979年边境战争、1956、1974、1988年海战。这些历史事件使得越南与中国在建立互信的努力上比世界任何国家难度更高。过去的事件至今还影响到两国人民的感情，使得两国人容易产生警惕、怀疑的心理。两国在各方面的不对称关系容易形成误解，各种问题容易被“政治化”。这是两国建立互信、发展关系的心理阻碍。再加上东海争端的复杂性，导致两国关系容易陷入不正常的状态，难以树立互信。

如今，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提高，加上网路信息的发展，民主意识的提高，使得主权问题特别受关注。这意味着主权和民族精神可以形成实力，也可以成为两国共产党在处理有关问题方面的压力。东海争端不仅是两国的对外问题而且也是两国内部稳定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对越南更加强烈反应的重要原因。

目前东海是中美在世界与地区范围战略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越南与美国和美国同盟、美国伙伴如 G7 国家、欧盟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有着实质性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与军事领域，越中关系被认为只是在外表和口头地发展，两国的合作特别是在东海的合作被缩小或遇到诸多阻碍，斗争性质明显增加。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梦，中华复兴事业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努力消除由西方国家提倡的“中国威胁论”，依靠于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觉得中国的战略不损害各国利益并且各国相信中国将来

的作为。实际上，东盟国家在经济方面依靠中国，但是安全方面又依赖其他伙伴。互信学说原理认为，互信一般是从周边国家的互信扩大到国际共同体，正因如此，“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与东盟的互信是中国的落脚点和基础，可以让中国获得国际的信任”（王日华 2014）。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政策或诸多对外开放政策为了扩大影响力，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人民币国际化、一路一带等政策是否成功主要依赖于中国如何化解疑虑，如何与包括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加强互信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倡议设立亚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中国外交部王毅认为，2015 年中国深化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越南是与中国有陆地和海上边界的邻居，与中国具有诸多共同点。正因如此，中国周边的命运共同体建设越南不可或缺。但是如何让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够形成、稳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认为，首先中国要让周边国家感到中国不具有安全的威胁，各国的国家利益得到尊重。处理好东海问题让越中两国关系不至于陷入僵局，让越南人民感到中国不具有威胁越南安全和主权的心理，以此来增进互信，为越中关系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具有加强中国在世界及区域软实力的意义。

中国是大国，跟越南相比，各方面都比越南强大。双方确定建立平等关系，但是实际上，中国与越南交往时，中国都站在主动的位置。因此为了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促进越中关系正常化发展，中国需要考虑并尊重越南的正当利益，主动提出解决办法并与越南共享利益，不要使用被国际评价为没有法理基础的九段线地图要求海上主权，同时坚持双边谈判的立场、摒弃东海紧张趋势是由声索国具有“国际化阴谋”和区外大国干涉的看法。

## 参考文献

1. 金一南著：《金一南讲世纪大格局中国有态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年。
2. 苏格主编：《国际秩序演变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 年。
3.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4. 张洁：《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5. 周文重：《斗而不破中美博弈与世界再平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6.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编著：《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7. Nguyễn Đình Liêm: Quan hệ Việt-Trung trước sự trỗi dậy của Trung Quốc,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Từ điển bách khoa, 2013
8. Phương Nguyễn: Bàn về lợi ích quốc gia và quan hệ của Trung Quốc với các nước lớn, các nước láng giềng,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Trung Quốc, 5-2013.
9. Phương Nguyễn: Quan hệ Việt-Trung năm 2015 và dự báo năm 2016,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Trung Quốc, 3-2016.
10. WSJ: Pentagon Says China has stepped up land reclam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wsj.com/articles/pentagon-says-china-has-stepped-up-land-reclamation-in-south-china-sea-1440120837>.



## 基于 Eviews 的中国大陆居民人均图书 拥有量分析与预测

王争辉、廖冰凌

**内容摘要:** GDP 被看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中国 GDP 快速增长, 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促进了各行业的繁荣。文化事业也因中国经济增速而活跃, 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人均图书拥有量逐年增加, 到 2016 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均图书拥有量为 6.27 册<sup>1</sup>。因此, 本文借助 Eviews6.0 软件对中国大陆地区人均 GDP 增长与人均图书拥有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并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预测模型, 试图为中国大陆地区图书出版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人均 GDP; 人均图书拥有量; evIEWS; 预测

**作者简介:** 王争辉,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博士生, 研究领域: 出版经营文化。邮箱: wangzhenghuiutar@gmail.com; 廖冰凌,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副教授, 研究领域: 印刷文化。邮箱: liaupl@utar.edu.my

**Title:**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Based on Eviews on the Books Per Capita Possession Among the Chinese

**Abstract:** GDP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GDP has improved rapidly and the Chinese consumption capacity continues to rise, promoting growth across all industries. Because of China's economic expansion, the cultural and sport sectors are also becoming alive with activities. Since 2006, China's per capita possession of books has increased annually, and by 2016, China's per capita possession of books is 6.27. Therefore, with

---

1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Eviews6.0 software we plan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GDP growth and per capita book ownership in China. We will establish a model to predi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ich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publication industry.

**Keywords:** Per capita GDP; Per capita possession of books; Eviews; Forecast

**Authors:** Wang Zhenghui,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Research area: Publishing Culture and Management Studies. Email: <wangzhenghuiutar@gmail.com>; Liau Ping Le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Research area: Print Culture Studies. Email: <liaupl@utar.edu.my>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这为居民多元化消费奠定了良好基础。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消费项目，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居民就有图书消费的记载，但当时图书消费是奢侈品，不能进入大众消费领域。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图书消费的黄金时期，但与今天相比，仍然有缺憾。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消费实力明显增强，人均图书拥有量逐年提升，图书消费不再是奢侈品，而变成了一般消费品。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大陆地区人均 GDP 增长与人均图书拥有量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有关理论，借助 Eviews 软件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试图为中国图书出版行业满足消费者需求提供决策参考。

## 一、Eviews 及文献综述

Eviews 是 Econometrics Views 的缩写，直译为“计量经济学观察”，业内称“计量经济学软件包。”它的本意是对社会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的数量规律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与技术进行“观察”。<sup>2</sup> 计量经济学及相关软件的发展为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发展经济更

---

2 孙敬水、马淑琴：《计量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离不开计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因此，计量经济学理论更适应现今转型期中国经济研究。Eviews 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技术支持，并被研究者广泛运用于经济、农业、消费、金融及贸易等各个领域。例如，在人力资本经济领域，杨佳倩（2017）运用 Eviews 研究了人力资本对中国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建立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模型；<sup>3</sup> 丁兆罡（2009）运用 Eviews 对中国安徽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sup>4</sup> 在居民消费领域，陈敏、周志明（2008）运用 Eviews 研究了区域内消费和支出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消费与支出关系模型；<sup>5</sup> 李翔（2013）运用 Eviews 研究了中国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影响因素。<sup>6</sup> 在汽车工业领域，张冬若（2017）运用 Eviews 对中国民用汽车发展进行了预测。<sup>7</sup> 在农业领域，吴琦磊、邓金堂（2010）运用 Eviews 对中国农产品产量与相关投入的模型与预测进行了研究；<sup>8</sup> 蒋亢（2012）运用 Eviews 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与汇率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sup>9</sup> 在金融领域，罗惠敏（2017）运用 Eviews 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sup>10</sup> 王柏程（2013）运用 Eviews 对中国银行汇率与国债价格关系进行了研究。<sup>11</sup> 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交通设施研究，贾桃桃

- 
- 3 杨佳倩：〈基于 EViews 的人力资本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经济》，2017 年第 1 期，第 68-69 页。
  - 4 丁兆罡：〈基于 EViews 的人力资本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第 20-22 页。
  - 5 陈敏、周志明：〈基于 Eviews 软件对某地区的消费和支出进行分析预测〉，《咸宁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第 8-11 页。
  - 6 李翔：〈基于 Eviews 软件分析的上海市区人均住房居住面积影响因素研究〉，《安阳工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第 59-62 页。
  - 7 张冬若：〈基于 EViews 对我国民用汽车发展的预测〉，《科技经济市场》，2017 年第 4 期，第 84-86 页。
  - 8 吴琦磊、邓金堂：〈基于 EViews 的我国农产品产量与相关投入的模型分析与预测检验〉，《情报探索》，2010 年第 51 期，第 39-41 页。
  - 9 蒋亢：〈农产品进口总额与汇率关系的实证分析〉，《大观周刊》，2012 年第 6 期，第 92-93 页。
  - 10 罗惠敏：〈基于 EViews 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和贵州省为例〉，《全国流通经济》，2017 年第 6 期，第 54-55 页。
  - 11 王柏程：〈计量软件 EViews 在宏观经济研究的应用以汇率与国债价格关系为例〉，《信息系统工程》，2013 年第 10 期，第 21-24 页。



(2016)以 Eviews 数据为基础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五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sup>12</sup> 杨晶、张一博、程中月(2013)运用 Eviews 对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sup>13</sup>

以上文献是各领域运用 Eviews 研究的代表,也体现了 Eviews 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应用的广泛性。总结已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借助 Eviews 软件对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 GDP 增长与人均图书拥有量进行分析,并根据 2006 年到 2016 年 11 年历史数据,运用 Eviews 预测出 2017 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均 GDP 及人均图书拥有量。在此基础上继续运用 Eviews 进行回归预测,发现人均 GDP 与人均图书拥有量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并建立了中国大陆地区人均 GDP 增长与人均图书拥有量的关系模型,希望能为参与中国图书出版的各类组织及个人提供决策信息支持。

## 二、数据描述

本文通过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收集了 11 年的中国大陆地区人均 GDP 和人均图书拥有量数据,时间段为 2006-2016 年,根据统计要求,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命名,人均图书拥有量为因变量 Y(册),人均 GDP 为自变量 X(美元)(如表 1)。

**表 1: 2006-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与人均图书拥有量**

年份	y	x	年份	y	x
2006	4.7	2069.3	2012	5.98	6188.19
2007	4.99	2651.26	2013	6.09	6807.43
2008	5.19	3413.59	2014	6.12	7593.88
2009	5.24	3748.93	2015	5.91	8016
2010	5.51	4432.96	2016	6.27	8865.99
2011	5.71	5444.8			

资料来源:作者制表

12 贾桃桃:〈“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五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基于 EViews 的数据模型分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 年第 21 期,第 57-59 页。

13 杨晶、张一博、程中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影响分析——基于 EViews 的实证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13 年第 7 期,第 10-11 页。

首先，解读表 1 数据，可以看出，2006-2016 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均 GDP(X) 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特别是 2010-2011 年人均 GDP 涨幅最大，为 1011.84 美元；2015-2016 年人均 GDP 涨幅为 849.99 美元；2013-2014 年人均 GDP 涨幅较大为 786.45 美元，2007-2008 年人均 GDP 涨幅为 762.33 美元。（如表 2）

**表 2：人均 GDP 逐年涨幅值**

年份	涨幅值	年份	涨幅值	年份	涨幅值
2006-2007	581.96	2010-2011	1011.84	2014-2015	422.12
2007-2008	762.33	2011-2012	743.39	2015-2016	849.99
2008-2009	335.34	2012-2013	619.24		
2009-2010	648.03	2013-2014	786.45		

资料来源：作者制表

其次，解读表 2，发现人均 GDP 涨幅比较高的年份有一些特殊原因。例如 2010-2011 年，2010 年中国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这应该是 2011 年较 2010 年增速快的原因之一。2009 年到 2010 年增幅比较快，与 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有关。2013-2014 年，虽然人均 GDP 涨幅比较高，但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公报显示，2014 年中国 GDP 增速为 7.4%，全年 GDP 增速创下 1990 年以来的新低，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但仍处于增长态势。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8865.99 美元，比 2015 年人均 GDP 额度高出 849.99 美元，年均增幅度开始回升。根据中国近一两年经济政策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广，以及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投资银行项目启动，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是中国 GDP 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再次，中国国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保持缓慢匀速增长。2015 年出现下滑趋势，但到 2016 年中国人均图书拥有量又开始增加，并且增加数量较大，成为 11 年中中国居民人均拥有图书最多的一年，这值得关注。由表（2）也可以看出，中国国民人均 GDP 增长量与图书拥有量有一定的关系，例如，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创历史新高，同时人均图书拥有量也创历史新高，其他各年份中国人均 GDP 增长也对人均图书拥有量有细微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均 GDP 对人均图书拥有量具体影响关系如何，本文根据 2006-2016 年

人均 GDP 和人均图书拥有量数据进行分析，试图建立中国居民图书拥有量数据模型，挖掘两者之间的关系。

### 三、模型选择

为挖掘中国人均 GDP 增长与人均图书拥有量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建立一元线性模型，对模型进行检验，确定模型预测的适应性，最终建立分析预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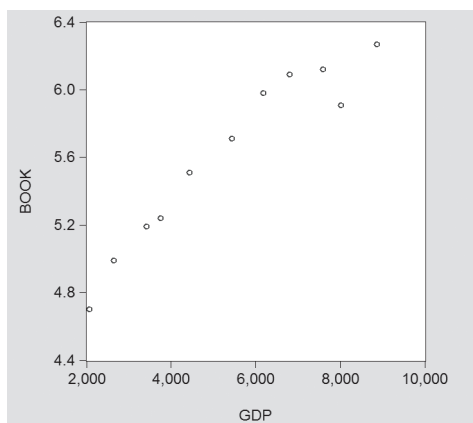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6 中国大陆地区人均 GDP 增长与人均图书拥有量之间关系散点图

依据散点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均 GDP 增长与人均图书拥有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建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如下：

$$y = a + \beta x + \mu \quad (1)$$

上式表示变量  $y$  与  $x$  之间的真实关系，其中  $y$  称为被解释变量（或相依变量、因变量）， $x$  称作解释变量（或独立变量、自变量）， $\mu$  称作随机误差项， $a$  称作常数项（截距项）， $\beta$  称作回归系数。在模型 (1) 中， $x$  是影响  $y$  变化的重要解释变量。本研究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 $\mu$  则包括了除  $x$  以外的影响  $y$  变化的众多微小因素。

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做线性回归分析，运用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前提是，假定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中的随机干扰项  $\mu$  是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首先需要检验  $\mu$  是否正态分布。具体方法是运用 Jarque—Bera（雅克—贝拉）检验，简称 JB 检验，此检验方法比较常用。JB 检验首先需要计算偏度系数 S（对概率密度函数对称性的度量）：

$$S = \frac{\sum (x_t - \bar{x})^3}{n \cdot \sigma_x^3} \quad (2)$$

峰度系数 K 值检验（对概率密度函数“胖瘦”的度量）：

$$K = \frac{\sum (x_t - \bar{x})^4}{n \cdot \sigma_x^4} \quad (3)$$

K 为峰度，n 为样本容量，若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则 S 为零，K 为 3。

Jarque 和 Bera 建立了如下检验统计量——JB 统计量：

$$JB = \frac{n}{6} \left[ s^2 + \frac{(k-3)^2}{4} \right] \quad (4)$$

其中，n 为样本容量，S 为偏度，K 为峰度。

(4) 式给出的 JB 统计量渐近地服从自由度为 2 的  $\chi^2$  分布，表示为：

$$JB_{asy} \sim \chi^2 \quad (5)$$

在正态分布的假设下，JB 统计量渐进地服从自由度为 2 的卡方分布， $JB_{asy} \sim \chi^2$  (5)。其中 S 为偏度，K 为峰度，n 为样本容量，若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则 S 为零，K 为 3，因而 JB 统计量的值为零；如果变量不是正态变量，则 JB 统计量将为一个逐渐增大值。

检验 JB，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由卡方检验临界

值表查出  $\chi^2(2) = 5.99147$ ，如果 (2) 式的计算结果超过临界  $\chi^2(2) = 5.99147$ ，则拒绝正态分布的假设。否则就接受原假设。具体检验过程依靠 Eviews6.0 进行，检验结果如 (表 3)。

**表 3：样本数据的一般统计特征**

	y	x
Mean	5.610000	5384.760
Median	5.710000	5444.790
Maximum	6.270000	8865.990
Minimum	4.700000	2069.340
Std. Dev.	0.519500	2291.879
Skewness	-0.380203	0.041982
Kurtosis	1.843870	1.685890
Jarque-Bera	0.877642	0.794720
Probability	0.644796	0.672092
Sum	61.71000	59232.36
Sum Sq. Dev.	2.698800	52527097
Observations	11	11

资料来源：作者制表

通过检验，Book 的 JB 值为 0.877642，GDP 的 JB 值为 0.794720；Book 的 S 值为 -0.380203，GDP 的 S 值为 0.041982；Book 的 K 值为 1.843870，GDP 的 K 值为 1.685890。对于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 $\chi^2(2) = 5.99147$ ， $JB = 0.877642 (0.794720) < 5.99147$ 。这表明通过 Eviews 软件计算得出的 JB 统计量不显著，不能拒绝零假设，即人均 GDP 回归的残差服从正态分布，该样本数据模型能够满足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假设，可以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表 4：一元回归方程

Dependent Variable: Y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8/03/17 Time: 17:29				
Sample: 2006 2016				
Included observations: 1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X	0.000218	2.09E-05	10.40070	0.0000
C	4.437249	0.121688	36.46415	0.0000
R-squared	0.923192	Mean dependent var		5.610000
Adjusted R-squared	0.914657	S.D. dependent var		0.519500
S.E.Of regression	0.151764	Akaike info criterion		-0.770015
Sum squared resid	0.207291	Schwarz criterion		-0.697671
Log likelihood	6.235085	Hannan-Quinn criter.		-0.815619
F-statistic	108.1746	Durbin-Watson stat		0.952342
Prob(F-statistic)	0.000003			

资料来源：作者制表

计算结果的标准格式如下：

$$y'_i = 4.437249 + 0.000218 \cdot x_i \quad (6)$$

Std ErrOr = (2.09E-05) (0.121688)

t-Statistic = (10.40070) (36.46415)

R-squared = 0.923192      Adjusted R-squared = 0.914657

F-statistic = 108.1746      DW = 0.952342      S.E = 0.151764

## 四、模型检验

### (一) 实际意义检验

实际意义检验的基础是经济学或数学理论判断和估计, 主要估计参数的正负符号是否合理, 估计回归方程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就本研究而言,  $\beta'=0.000218$ , 符合人均 GDP 增加的基本假设, 也就是说人均图书拥有量随着人均 GDP 增加而增加, 具体为中国人均 GDP 每增加 1%, 人均图书拥有量增加 0.0218%。

### (二) 估计标准误差评价

估计标准误差是根据样本资料进行计算的, 用来反映被解释的实际值  $y_t$  与估计值平均误差程度的指标,  $\hat{\sigma}=S.E$  越大, 则回归直线精度越低; S.E 越小, 则回归直线精度越高, 代表性越好。当 S.E=0 时, 表示所有的样本点都落在回归直线上,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表现为函数关系。

本研究中, S.E=0.151764, 也就是说估计标准误差为 0.151764 (美元), 表明中国人均 GDP 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平均误差为 0.151764 (美元)。

### (三) 拟合优度检验

拟合优度是指样本回归直线与样本观测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 用样本决定系数的大小来表示。决定系数用来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

本研究中, R-squared=0.923192, 说明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为 92.32%, 表明中国人均图书拥有量变差中, 由解释变量中国人均 GDP 值 X 解释的部分占 92.32%, 或者说, 中国人均图书拥有量变动的 92.32% 可以由样本回归直线作出解释, 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 (四) 参数显著性检验

对于参数  $\beta$ , t 统计量为 10.40070, 给定  $\alpha=0.05$ , 查 t 分布表, 在自由度为  $n-2=9$  下, 临界值  $t_{0.025}(9)=2.262$ , 因为  $t=9.06995 > t_{0.025}(9)=2.262$ , 所以拒接  $H_0: \beta=0$ , 表明中国人均 GDP 变化对

人均图书拥有量有显著影响。

## 五、预测

样本估计期内被解释变量的拟合值计算，通过 Eviews6.0 中的 Equation 菜单及 Forecast 项进行预测计算（如图 2），拟合变量记为 YF。同时可以作出模型的拟合和残差图（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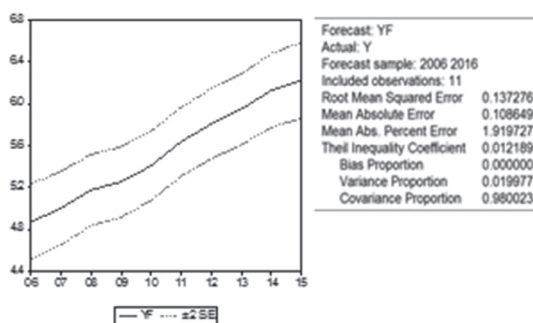


图 2：拟合值与实际值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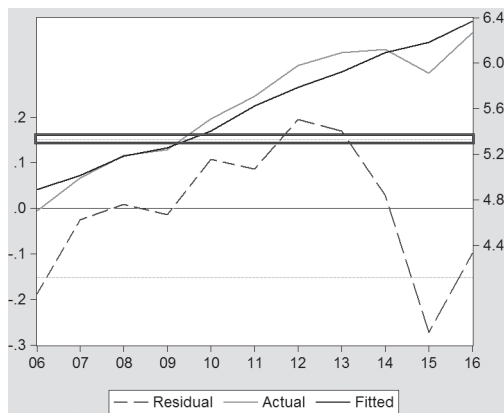


图 3：模型的拟合图和残差图

根据建立的一元回归模型，以 2017 年为例，对 2017 年中国人均图书拥有量进行试验性预测，2017 年人均 GDP 无法通过国家统计局获得，只能进行预测，这里采用指数平滑法预测。虽然指数平



滑法适用于经济时间序列有明显季节波动和趋势的预测，但在实际应用中，有些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如股票数据）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和趋势变动，对于这样的单指标时间序列数据，也可以采用指数平滑法进行预测。因此，本文先通过指数平滑法预测 2017 年中国人均 GDP，再通过一元线性模型预测 2017 年人均图书拥有量。

**表 5：2017 年人均 GDP 预测结果**

Date: 08/04/17	Time: 10:25
Sample: 2006	2016
Included observations:	11
Method:	Single Exponential
Original Series:	X
Forecast Series:	XSM
Parameters: Alpha	0.9990
Sum of Squared Residuals	7411141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820.8167
End of Period Levels: Mean	8865.140

资料来源：作者制表

通过指数平滑法进行预测，预测 2017 年人均 GDP 估计值为 8865.140 美元（表 5）。根据 2017 年人均 GDP 预测值，运用 Eviews 进行 2017 年人均图书拥有量预测，预测结果为人均拥有图书 6.37 册。

最终确定中国人均图书拥有量预测模型为：

$$y'_t = 4.437249 + 0.000218 \cdot x_t \quad (7)$$

$y'_{2017}$  预测区间分析，借助 Eviews6.0 对  $x$ 、 $y$  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表 6: 描述统计结果

	X	Y
Mean	5674.792	5.673166
Median	5816.490	5.810000
Maximum	8865.990	6.367995
Minimum	2069.340	4.700000
Std. Dev.	2405.122	0.541503
Skewness	-0.059244	-0.410816
Kurtosis	1.622567	1.899917
Jarque-Bera	0.955681	0.942631
Probability	0.620121	0.624181
Sum	68097.50	68.07799
Sum Sq. Dev.	63630721	3.225476
Observations	12	12

资料来源: 作者制表

根据表 6 进行 2017 年区间预测分析。

$$\Sigma(x_t - \bar{x})^2 = \sigma_x^2 \cdot (n - 1) = (2405.122)^2 \times 10 = 57846118.3 \quad (8)$$

$$(x_{2016} - \bar{x})^2 = (8865.140 - 5674.792)^2 = 10178320.4 \quad (9)$$

综合显著性水平  $\alpha=0.05$ , 查表得  $t_{0.025}(9) = 2.262$

$$y_f = y'_f \pm t_{\alpha/2}(n-2) \cdot \sigma' \sqrt{1 + \frac{1}{n} + \frac{(x_f - \bar{x})^2}{\Sigma(x_t - \bar{x})^2}} \quad (10)$$

根据以上公式可计算出  $y_{2017}$  的预测区间为:

$$y_f = 6.23 \pm 2.262 \times 0.151764 \times 1.267 = 6.23 \pm 0.435 \quad (11)$$

即  $y_f$  的 95% 预测区间为 (5.795, 6.665), 即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 2017 年中国大陆地区居民图书拥有量区间在 5.795 到 6.665 本之间波动。

## 六、结语

本文根据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知识,建立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 GDP 与人均图书拥有量的一元线性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分析,模型符合各检验指标要求。因此,模型能科学预测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图书拥有量走势。根据预测模型可知,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 GDP 每增长 1%,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图书拥有量将增加 0.000218 本。模型预测结果也证明了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 GDP 增长与人均图书拥有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已经对 2017 年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拥有图书量进行了简单预测,预测结果为 2017 年人均拥有图书量为 6.37 册,虽然已经做出了预测,但预测结果仍有一定偏差,因为模型中自变量人均 GDP 也是一个预测结果。因此,2017 年中国图书拥有量只能是一个简单参考,而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图书拥有量预测模型具有准确性,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 GDP 不断增长,模型中自变量会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因变量值。由于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 GDP 增长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伴有波动性,以及预测误差影响等,所以,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中国人均图书拥有量也只能是一个区间,本文预测区间为 (5.795,6.665),即随着中国人均 GDP 波动,图书拥有量也会处于一个变化区间内,并且这一区间也属于动态区间。

随着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发展,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 GDP 也将会继续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地区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将不断增加。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恩格尔系数指标测算结果,2016 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 30.1%,接近 30%。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 60% 以上为贫困,50%-59% 为温饱,40%-49% 为小康,30%-39% 为富裕,30% 以下为最富裕。中国恩格尔系数的标准,说明中国已经快接近最富裕的程度。这个数据也说明中国居民主要消费支出已经不在食品购买方面,已经开始关注文化及娱乐等方面的消费,而文化消费又包含图书消费。因此,中国人均 GDP 增长,将继续影响中国居民人均图书拥有量。

根据中国大陆地区居民 11 年,人均图书拥有量的走势来看,人均图书拥有量仍然有一定的波动。通过本文回归模型测算,可以

肯定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 GDP 增长对居民人均图书拥有量波动变化有一定影响。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中国大陆地区居民人均图书拥有量,这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中国扫盲计划的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及中国高等教育总量的扩大等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大陆居民人均图书拥有量变化的指标,而具体是否有影响关系,影响关系有多大,这些具体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及其他分析方法进行检测和解释。

### 参考文献

1. 陈启蕊:〈基于 Eviews 软件的云南省城镇居民消费和支出分析预测〉,《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9 期,第 36-40 页。
2. 樊欢欢:《Eviews 统计分析与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第 90-95 页。
3.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30 页。
4. 贾俊平:《统计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13 页。
5. 李子奈:《高等计量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24 页。
6. 赵红平:〈EViews6 软件的逐步回归分析模块在多重共线性教学中的应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09 年第 12 期,第 31-34 页。



## “西进” 武侠电影的象、形、神 ——以李安的《卧虎藏龙》为例

黄华、纪士欣

**内容摘要:** 如果把华语武侠电影进入欧美主流电影院线的过程视作一次“西进”运动, 那么, 电影《卧虎藏龙》便是“西进”成功的重要标志。《卧虎藏龙》从武打形式到人物形象塑造、精神内涵的表达, 都反映出华语武侠片在融入国际市场过程中的自觉转型。它将东方景色以清丽古雅的水墨图景展现出来, 形式多样的文艺化武打构成武侠的“象”, 推动“武”向“舞”的转变, 建立武打与言情的联系。电影淡化了晚清封建伦理的色彩, 突出个体性格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从现代人的视角呈现侠客的个体欲望, 勾勒悲情侠客的“形”; 摒弃用“以暴制暴”的武打表现人物的反抗, 转而通过人物语言和行为来表现压抑基调中的反抗精神, 传达武侠电影的“神”。

**关键词:** 《卧虎藏龙》; 武侠电影; 个体欲望; 反抗精神

**作者简介:** 黄华(1974-),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邮箱: huanghua2021@126.com; 纪士欣(1992-), 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

**Title:** Discussing the Image, Shape and Charm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in “Westward Movement” - Illustrated by Ang Lee’s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Abstract:** If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entering the mainstream cinema line in Europe and America can be regarded as “Westward Movement”,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success. From martial arts forms, characters’

image-building to the expression of spiritual connotation,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showed conscious transformation to integrate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 It presented the imaginary orient in martial arts films with ink painting style pictures by using various forms of literary style martial arts to create the image of "Wu Xia". It promoted martial arts changes from "fight" to "dance" and established a link between fighting and expressing emotions. Meanwhile, this film weakened the color of feudal ethic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highlighted the impact of character on destiny and individual desire by drawing the "shape" of the swordsman from the view of modern humans. Instead of violent fight, the film expressed spirits of resistance by the dialogue and action choices of characters to convey the "charm"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Keywords:**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martial arts film; individual desire; spirits of resistance

**Authors:** Dr. Huang Hua (1974-),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i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huanghua2021@126.com>; Shixin Ji (1992-), post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Literature i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 一、前言

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过程，尤其是向欧美主流电影院线扩展的尝试，可以看作中国电影的一场“西进”运动。如果把武侠电影国际化的过程看作其中一部分，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可谓关键性的一步。2001年《卧虎藏龙》同时荣膺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和美国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成为中国武侠电影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的重要标志。

中国武侠电影作为脱胎于武侠小说的特殊电影类型，其风格随时代变化而转变，武侠电影发展至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神仙、魔怪参与的武侠，将仙风道骨、天地三界的故事融入在武侠中，风格奇幻，如《新蜀山剑侠》；第二类改编根据真实历史人物事迹写成的武侠传奇、演义，突出写实武打与家国情怀，如《黄飞鸿》系列；第三类在武林争斗中以虚构的情节人物，表现虚构的人间现实江湖，如《侠女》、《卧虎藏龙》。尽管第二类武侠电影的

数量最多，例如“香港电影史上集次最多”的电影《黄飞鸿》系列，但成为“西进”主力的却是第三类武侠电影。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香港武侠电影为代表的华语电影逐渐走向世界。1975年胡金铨的《侠女》获得第28届戛纳电影节综合技术奖，武侠电影初获国际认可，开始在“西进”的道路上迈进。之后，《卧虎藏龙》的成功“西进”再次掀起武侠热。经过胡金铨、张彻、徐克、袁和平、王家卫、李安、张艺谋等几代电影人的努力，武侠电影由“以武带人”转为“以人带武”，对古典意境营造、个体情感表达和影片思想价值的重视，把武侠电影带入了更高的层次。

通过《卧虎藏龙》，李安把自己对儒侠的想象和西方人对于个体意愿的强调相结合，借外在武打的“象”，走向武侠世界快意恩仇的背面，揭开侠客作为普通人无奈的一面，走进“侠”的内心，刻画悲情侠客的“形”，通过人情与心性，传达出武侠电影的“神”。

## 二、象：水墨图景下的文艺“舞”打

武侠电影中，武打是最重要的看点，打斗的场景和动作设计是武侠电影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最早把武侠电影推向世界的导演胡金铨，开创了结合京剧武戏表演艺术和富有东方气韵的山水景色来设计武侠打斗场景的先例，李安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做法，将文艺化的武打和含蓄幽美的水墨图景相结合，呈现出具有东方韵味的“象”。

为了区别于通俗类的武打片，电影《侠女》在场景制作上精益求精，使自然山水呈现出醇正的古典文艺气息，幽美的意境与武打配合呈现出动静结合的美感。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竹林”。《侠女》里第一次出现“竹林打斗”，苍翠的竹林配合鼓点与自然光束，形成了充满禅意的自然空间，提升了武打场景的审美境界。到了《卧虎藏龙》，李安把古典文艺感从借静态景物扩展到动态打斗，通过由静到动的发展，增强了武侠电影的文艺片的观感，从而获得西方主流院线的广泛认可，走向“雅”的境界。

《卧虎藏龙》中打戏的文艺化特点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水墨景色与故事情景的配合，打戏的目的在于传情；二是放慢的武打节



奏；三是武打形式的灵活变化。李安在夸张和写实之间寻求平衡，创造出戏剧舞台般的观感，使人物的打斗与环境相配合，把观看打斗的视觉快感、动作的美感、整体意境的美和人物情感变化融为一体。影片没有刻意追求武侠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差异性，摒弃夸张的空间色彩、人物造型或极端的拼贴手法，没有刻意突出环境的阴冷怪异及武侠空间光怪陆离的一面。转而选择低反差胶片，把给人平实安逸感的水墨画风格作为整个电影的画面色彩主调。

首先是水墨景色与故事情景的配合，《卧虎藏龙》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竹林打斗”一段，李安把竹林空间的运用与人物情感结合起来，突出人物性格特点和心理的细微变化。竹林是最能体现水墨景色的外景地，也是不少导演喜爱的背景。在胡金铨的《侠女》（1971年）和张艺谋的《十面埋伏》（2004年）里都设置了竹林打戏，但是在这两部电影里，竹林的作用止于表现武打场面的精彩，为展示“武”而服务，很少涉及“情”。《侠女》中的竹林戏，包括射箭、追踪、骑马等一系列动作，竹林的作用在于遮挡视线，便于人物隐藏，通过密林制造出幽暗隐秘的环境。《十面埋伏》则借竹竿的尖部作为攻击武器，融入打斗，以高处竹叶的纷飞抖动，体现武打的激烈程度和人物打斗的力度。但是李安对于竹林戏的要求是要拍出“意乱情迷”的感觉。这里的竹林打戏与其说是一场比武，不如说是李慕白、玉娇龙二人的心理较量和多种复杂情绪的交缠。

在《卧虎藏龙》里，打斗主空间由便于隐藏的竹林里，转变为显露于外的竹林上空，竹子不再承担分割空间和遮挡人物的功能，转而把竹子“软”和“韧”的特点加以利用，以竹林在风中轻摇和人物在上下纵向空间里的打斗，表现特有的飘逸感，显现出李慕白的功夫的“虚灵”和玉娇龙劲道的“松沉”。竹子的韧劲一如玉娇龙百折不挠、柔中带刚的性格，又照应了李慕白“直以本身，空以体道”的儒侠特质。李慕白借力打力的功夫更胜一筹，因此在这场打斗中始终以长者传道的姿态占据着空间的主导位置。玉娇龙忌惮李慕白，将他视为圆滑又保守的老江湖，面对他的规劝，既反感又戒备；但几次交流之后又不得不对他心生敬畏，在无形中受到他的影响。玉娇龙的邪气既让她有着不可约束的破坏力，也体现了她追求心性自由的特质。玉娇龙恰似李慕白心中的江湖，既有它的凶险幽深，也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打斗画面多次以固定镜头和远景

来展示，竹林如一片翠绿的海，人物随竹林而动，飘游其中，若隐若现，照应着二人内心情绪的起伏不定，他们互相揣测试探，复杂情绪的交织代替激烈的打斗动作，竹林的主要作用变为达情。

其次，《卧虎藏龙》改变了武打的节奏，通过放慢打斗节奏及其与音乐、台词的配合，使武打由比武斗狠变为赏心悦目的舞台表演。对于武打，李安认为，西方动作片比我们慢很多，打斗时刀戟相撞，“铛”的一下，很笨拙，可是人的情绪比较投入。中国武侠片打得很炫，可是情绪不投入，就像看京剧武场的表演，观众不会紧张<sup>1</sup>。因此，他把两种打法结合，放慢节奏，既吸收了京剧舞台武打动作的“好看”，又借鉴了西方动作片中打斗的写实风格。打斗不必展现快、狠、准，只需展现灵动，放慢节奏同样是为了表现人物情绪。竹林打斗中，晃动的竹林、翩飞的人物根本不像是在打，而是在舞。玉娇龙的面部大特写镜头的插入，完全打断了武打的节奏，制造了打斗过程中一个游离的停滞瞬间，以缓慢的速度展示了人物的犹疑的眼神。

聚星楼比武一段，以吟诗的形式放缓了打斗节奏。在聚星楼武打情节中，李安把武打与吟诗结合起来。玉娇龙边打边吟诗，诗曰：“我乃是潇洒人间一剑仙，青冥宝剑胜龙泉，任凭李俞江南鹤，都要低头求我怜！”吟诗配合武打突出了玉娇龙桀骜不驯、自负自大，初入江湖不知轻重的性格特点。打斗中不断穿插上下方向的飞跃、空翻动作，镜头跟随人物一起一落，发挥了电影武打比戏剧舞台武打更加真实可感的优势。玉娇龙高强的武功和顽劣俏皮的个性显露无疑。有打有唱使“武”向“舞”的转变更进一步，节奏流畅又不失观看的紧张感，通过改变打的方式彰显出人物个性，也借此为观众与人物的短时间交流留下空间。因此，这段诗文配合对于节奏控制的作用，与成龙功夫电影中的幽默诙谐元素一样，变为电影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

第三，《卧虎藏龙》几场武打戏的整体安排也一反常规，每场的风格都会发生变化，形成微妙的变奏。《新龙门客栈》等武侠电影的武打高潮通常设置在片尾的决战中，通过酣畅淋漓的最后一战制服反派，展示的是一种豪情。然而，《卧虎藏龙》的开头结尾都

1 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72页。

没有为彰显武力而设置的打戏，李慕白与碧眼狐狸的决战以暗器的形式开始，又瞬间结束，正反两大人物的武功几乎未经展露。几场重要的打戏以各自不同的风格穿插在故事中，分别是玉娇龙与俞秀莲在北京城飞檐走壁的夜战，二人在雄远镖局的十八般兵器对打，以及玉娇龙与李慕白在寺院与竹林的两场对打。夜战一场，李安以连续的镜头在长达三分钟的时间里展现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式飞檐走壁，赋予轻功超脱、浪漫、牵制于一体的象征意义；聚星楼打斗以有节奏的打斗配合俏皮幽默的台词，正面展现了玉娇龙的反叛性格；竹林争斗借武打展现李慕白和玉娇龙迷乱的心境。镖局一场则是俞秀莲和玉娇龙内心角力和情感张力的外化。镖局对打中，玉娇龙倚仗青冥剑在手，数次故意挑衅，使得俞秀莲一改往常理性的行为，与之发生言语冲突，在忍无可忍中用尽镖局兵器终于以一把断剑挟住玉娇龙。然而，玉娇龙却趁着搭话反刺一剑，占据上风，电影凭借这个细节把玉娇龙性格中的蛮横与邪气展露无疑。

由此可以看出，李安的每场武戏都在为文戏做铺垫，并且每一场的形式为配合人物情绪都会进行创新，尝试突破空间仅仅参与叙事的局限，去发掘空间传情达意的功能，实现武戏艺术化，表现人物性格中戏剧性的一面。使水墨画般明丽清新的意境、打斗情景与动态情感变化互相交融。尽管在《卧虎藏龙》之后，《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片中也出现了注重画面感的“舞”打，但《英雄》突出画面中瑰丽的视觉幻象，成为基于表现主义的实验，纯然为了一种视觉上的美感，一种美学意念的驰想<sup>2</sup>。《十面埋伏》中的竹林不再是清淡古雅的水墨背景，而与人物鲜艳的服饰一道，蜕变成绚丽的画面场景。更重要的是这些“舞”打虽然借鉴了《卧虎藏龙》对武侠空间的处理，但创新的力度不大，相反有时因为空间变化与情节没有多大联系而削弱了故事的连续性。

### 三、形：个体欲望中的悲情侠客

武侠电影一向注重对侠情的刻画，但是极少真正走入个体的内心世界，李安在《卧虎藏龙》中强化个体欲望，使个性与欲望成为

2 陈岸峰：〈武侠美学与传承、创新与驰想：《卧虎藏龙》与《英雄》的比较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34页。

武侠电影表现的重点，塑造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侠客“形”象。具备现代意识的人物和表现个体欲望的主题使《卧虎藏龙》的价值观易于被当代观众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吻合，这是促成《卧虎藏龙》成功“西进”不可忽视的因素。

突出“人”如何在与自我、与世界的相处中寻找平衡，是李安电影的一贯主题。李安曾提到拍摄武侠片的初衷：我爱它，因为它是我们中国压抑社会的一种幻想，一种潜意识的抒发，一种情绪的逃避<sup>3</sup>。王度庐的武侠小说被视作民国武侠小说中“悲剧侠情”的代表。小说中的人物会武功，但不会绝世武功；是英雄，但不是盖世英雄；是侠客，却没有侠客的潇洒；是普通百姓、官家小姐，却都怀着真实又虚幻的江湖梦。无论作为江湖道德体制典范的俞秀莲，还是出身富贵之家的玉娇龙，都是纠结于种种现实羁绊而无可奈何的人。电影《卧虎藏龙》在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侠”的视角转变为“人”的视角，赋予角色现代人的思想意识，突出对“自我”的发现与表现，外在斗争被转换为不同性格的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心理拉锯战。基于对个体命运的思考，电影《卧虎藏龙》塑造了挣扎在欲望与戒律、压抑与自由之间的悲情侠客形象。

首先，电影把善恶、真假、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进行模糊处理，淡化了传统儒侠“济世安民”的家国理念，个体情感取代家国的“仇”与“义”，成为影响并引导人物行为和命运的主要因素。

在《卧虎藏龙》前的武侠电影中，家仇国恨是激发矛盾的主因。《侠女》中左副都御史杨涟之女杨慧贞与东厂杀手的对峙就是誓不两立的正邪两派，家仇国恨带动物人流离辗转。《新龙门客栈》虽然将主场景设置在边关大漠，讲的仍是东厂统治阶层与民间反抗势力的争斗。老板娘金镶玉虽然八面玲珑，最终仍站在义士周淮安一方，对抗东厂。这些电影都为武侠人物设定了一个大的政治环境，他们被迫卷入其中，个体的光芒依附家国情怀、春秋大义才能体现。

但在《卧虎藏龙》中看不到“济世安民，反抗强权”的豪侠情怀，情节发展的驱动力由“仇”变为“愁”。电影把王度庐原著中

3 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阴险狠辣的反面角色费伯绅完全删去，将李、俞、玉三人夺剑、授艺、收徒等作为主要情节加以扩展。由此，黑白分明的善恶争斗变为善与善的较量，外在的恩怨争斗被人心的江湖所取代，伴随青冥剑的流转，人性的复杂在暗潮汹涌中展现出来。每个人都站在“对”的框架中企图使事情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玉娇龙一面果决勇敢，为了拥有命运的自主权而大打出手、不惜孤身战群雄，另一面又阳奉阴违地对待“俞姐姐”和师娘。李、俞站在自己的立场想要平息混乱、安稳度日，但是李、俞遵守的规矩恰恰是玉娇龙要逃离的围城：俞秀莲劝说玉娇龙安心出嫁，屈从命运的目的是保全家族颜面，代价却是要违背自我本心。李慕白则一心想把玉娇龙收为徒弟，将她带入门派规制中进行教导约束，以防她成为一条毒龙。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大侠，却真中有假，以自己的原则挟制玉娇龙。

反过来，即便碧眼狐狸这样的恶人，对待玉娇龙的情感也是假中有真。碧眼狐狸想借武当剑法心诀掌握武当功夫精髓，可是玉娇龙却早已看穿她的心思，隐瞒心诀，斩断了她的武林梦。她以江湖的刺激好玩教唆玉娇龙冲出樊笼，又想让她从心里接受自己，成为自己的臂膀。结果面对的是徒弟的刻意隐瞒和不动声色的背叛。她奄奄一息时，道出了心中所想：娇龙，我唯一的亲，唯一的仇！碧眼狐狸与玉娇龙之间，除师徒之情外，还有母女之情、主仆之情和各自想要控制对方加以利用的野心，每一种感情都真假参半。善与善的对立展现出变化的、动态的复杂人性，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

其次，电影改编把一出社会悲剧转变为性格悲剧。原著小说中的悲剧很大程度上由人物的身世导致，是典型的社会悲剧，然而电影删去罗小虎的身世之悲、玉娇龙对家庭的无法割舍、对门第观念的重视等，将故事发生的主因由外在的社会因素作用转变为性格因素作用。

在小说里，王度庐用大量笔墨描写了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把满清的社会现实作为影响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罗小虎本为汉人，因遭奸人陷害，父死母亡，兄妹离散。为问清身世，寻找恩人，辗转流浪到新疆为盗。他的家难反映了封建官僚以权压人，仗势作恶的社会现实，也映射了王度庐对民国社会现实黑暗面的揭露。罗小虎与玉娇龙爱情的最大阻碍是金钱与门第。玉娇龙曾数次嘱咐罗小

虎走仕途，加官进爵后再来求亲。书中以罗小虎的数次纠缠和玉娇龙的最终失望，来表现封建门第观念以及社会贫富等级对爱情的扼杀。徐斯年曾评价王度庐的小说：深刻淋漓地描绘了“金钱”如何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观念和唯一价值标准，如何与传统的父权、男权结合而使它们更加无耻，如何导致社会的险恶和人情的异化<sup>4</sup>。

电影《卧虎藏龙》把“金钱与爱情”的矛盾转变为“压抑与自由”的矛盾，玉娇龙这一角色在电影中如同希腊悲剧中对抗命运的英雄们，强者的无奈与个体的光芒尤为突出。电影删减了小说中玉娇龙出走和归家后遭遇的阻碍，以及她“闯祸”后面对母亲的生病去世、家庭的压力、鲁家的威胁经历的种种内心变化。罗小虎与玉娇龙的故事被简化为浪漫沙漠爱情，罗小虎不再背负家仇，玉娇龙也没有经历家庭的变故。电影以青冥剑的丢失与流转为线索，表现重点转变为玉娇龙在盗剑、出走、比武等经历中的内心成长，讲述她在正派与邪道、欲望与戒律的夹缝中追寻江湖梦的过程，女主人公的行为动机源于她复杂的个性。玉娇龙学武的目的并非为了争霸或报仇，而是为了追求更广阔的自由；不仅是选择爱情婚姻的自由，而且是选择生活方式、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因此，最后跳崖的一场戏，由原著中的“投崖尽愚孝”，变成对罗小虎所说的传说故事“心诚则灵”的验证。她最终选择的既不是李慕白的武当门派，也不是罗小虎的爱情荫蔽，而是心中那个可以肆意徜徉的虚幻江湖。玉娇龙的桀骜决定了她的决绝；她的机敏又让她看穿了江湖的虚幻，深知无拘无束的自由江湖不会存在于现实社会。她的跳跃与其说是被迫，不如说是自愿。纵身一跃是对自由选择权的持守，也是一种彻底的反叛和直面绝境的勇气，无限自由只能存在于脱离现实的虚无世界中。

再次，电影把单一的罗小虎、玉娇龙的感情线索转变为多条相互交叉的双边关系线索，通过充满张力的人物关系，突出了人在潜意识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的艰难挣扎。从李安的电影中，能看到“他人即是地狱”的存在主义思想，也能看到以“和”为本的人际调和。主体的自我意志与他人意志发生摩擦碰撞的痛苦始终存在；但结局往往是化激进为柔和，在各退一步中寻求解决之道。

李安把人物性格的两面性形容为“阴阳两性”，并直言对“探

4 王度庐：《卧虎藏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总序〉第2页。

讨两个女角阴阳混杂的灰色地带”<sup>5</sup> 很有兴趣。李安电影中的角色如同时刻携带着一面镜子的人，这面镜子可能是他人他物，也可能是自我本心。他们在自我与他人的接触中改变，又在自我矛盾中有意或无意地进行反思。电影《卧虎藏龙》通过拓展人物欲望情感空间，使“卧虎藏龙”有了新的含义，由外在转向人心，指内心隐含的潜在欲望和潜意识情感，故指代隐藏着众多武林高手的风雨江湖。原著小说以罗小虎、玉娇龙的感情为主线，李慕白与玉娇龙的交集止于追讨青冥剑，并没有情感的交流。电影中把玉、罗、李、俞四人连接，形成多条双边关系，每个人都处在多项互动中，变成一张人物关系网。由此，李慕白和玉娇龙之间似是而非的情愫、俞秀莲和玉娇龙两个女性角色关系的张力被显现出来。

玉娇龙和俞秀莲分别代表了以感性冲动为情感主导和以理性克制为生活原则的两种人。她们彼此个性中外显的因素在互动中相互映衬，成为激发潜意识欲望的诱因。俞秀莲对玉娇龙的骄纵顽固明白于心，但是却几次对话中觉得她在顽劣之外自有她的可爱之处，她的随性与自我是俞秀莲始终渴求又无法做到的。但是当李慕白向俞表露他想帮助她回归武学正途时，俞秀莲又马上加以阻止，她等待着李慕白对自己的回应，期盼与李慕白一起过上内心想要的平静生活，不想被任何事从中阻拦。每当玉娇龙出现时，俞秀莲感性冲动的一面就会不自觉地显露。性格中显隐互换的两面性是内心矛盾的外在表现，电影通过人物互动碰撞的火花发掘了“自我”的多重侧面，唤起“本我”的欲望，这种欲望与人物被定义的社会身份与道德伦理的冲突造就了《卧虎藏龙》中侠客的“悲情”。

《卧虎藏龙》把侠客悲情的根源归于个体对欲望的追求、对内在冲动的反思，淡化了侠客作为特定群体的社会责任。这种“悲情”脱离了家国情怀，源于“本我”的欲望，使武侠故事有了宣扬个体独立精神的意味，因此，更易于被西方观众认可。

---

5 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85页。

#### 四、神：压抑基调中的反抗精神

武侠电影常有浪漫、野性甚至狂放的一面，其宣扬的价值核心是侠义精神，其中的“义”多以反抗行为表现出来。无论《侠女》，还是《新龙门客栈》，再到最近的《绣春刀》，武侠电影中的反抗多表现以弱胜强、邪不压正，反抗强权与不公命运的方式多是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但是，《卧虎藏龙》几乎抹去了武侠电影的暴力色彩，反抗的对象不再是看得见的强敌，而是看不见的伦理规制和道德权威。反抗的方式不是纯粹的以暴制暴，而是人物顺从本心的行为选择。电影中的反抗一方面表现在对权威与典范的戏谑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男女主人公的行为选择和结局的安排。整部电影在压抑的基调下始终能看到一种贯穿始终的反抗精神，形成《卧虎藏龙》的“神”韵。

在玉娇龙原本的认知里，存在着三个江湖，一种是碧眼狐狸所说的既好玩刺激又可怕的江湖，另一种是俞秀莲所说的以义为律、但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江湖，第三种是侠义小说里侠骨柔情、快意恩仇的江湖。玉娇龙的行为选择一直由第三种江湖，即“想象江湖”主导，她锐利直率的言语、锋芒毕露的个性恰恰是自己理想中敢打敢杀、直来直去的侠客形象。玉娇龙的肆意冲撞恰似人性的本真完全释放不受约束的状态，横冲直撞中带着未经人情世俗污染的天真。她的“骂”展现了对权威典范的蔑视与讽刺。

李慕白这位江湖道德典范被玉娇龙归类为见不得本心的老江湖。得知李、俞插手罗小虎之事，玉娇龙当即翻脸，对俞秀莲道：“朋友本来就是假的，只不过我怀疑做我的敌人你能撑多久！”在聚星楼比武中，为了教训玉娇龙，各门派武林人士前来挑战，面对众人开打前自报家门的滑稽举动，玉娇龙直斥名字太啰嗦，之后又对僧人道：“和尚不念经，跑到这里开荤也该教训！”随后，江湖英雄们被打得鼻青脸肿，乱作一团。此段最后一个镜头，客栈楼梯地板整体坍塌。这里的客栈，只是虚伪的英雄避所，而非真正卧虎藏龙之地，不经打的客栈，正如空有虚名的江湖英雄和被奉为圭臬却钳制人心的规章典范。坍塌景象的安排，是借玉娇龙之口，对徒有名号没有实力的所谓权威者的讽刺。玉娇龙的反叛是外露的锋芒，而李慕白的反抗则是通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选择从侧面展现



出来。

李慕白临死时向俞秀莲表明心意，宁做野鬼不做孤魂，放弃了守住最后的真气以保全性命。他在入定后即将达到修行至高境界时，突然感到空虚，一切真实化为虚幻，无情无欲带给他的不是超然洒脱，而是悲哀、失落甚至是一丝恐惧。这与玉娇龙面对碧眼狐狸的质问时讲述的一段话如出一辙：“可是有一天，我发现我可以击败你，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害怕，我看不到天地的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又能跟随谁？”李慕白和玉娇龙都是站在武学制高点的人，却同时感觉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孤寂。最终，都以付出生命的代价选择保守人性的本真，遵循心中欲望。通过对比外在的强大与内心的脆弱，电影演绎了强者的困境，以一种并不激烈的反抗形式展现玉娇龙忠于本心的执着和李慕白从“尊礼”到“尊情”的转变。

从电影结局来看，主要人物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玉娇龙从崖壁纵身跳入未知的云海中；李慕白遗憾地死在俞秀莲的怀里；俞秀莲等到了言明的爱，却没等到长久的陪伴。但是，最终的选择里包含了每一个角色对本性的发现和追随。电影以压抑基调中的反抗精神揭示出“武”的灵魂不在技艺，而在人心，真正的强与弱，不在于武功，而在于内心。面对善善对立的冲突，李安总会以去政治化、去性别化的视角去观察人物，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显示出可贵的悲悯情怀。因此，电影《卧虎藏龙》的结局安排超越了是非定论，呈现出谜一般发人深思的魅力。

## 五、结语

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武侠电影中，徐克以怪诞诡谲的风格把武侠与历史相联系，塑造了众多颠覆经典的人物形象，包括青蛇、狄仁杰、东方不败。王家卫把现代都市人普遍的漂泊感和疏离感带入武侠世界，成就了《东邪西毒》梦境般的非现实空间，欧阳锋梦中呓语般的自言自语，使整部电影如同个人意识流动的外化。《卧虎藏龙》则开文艺武侠片之先，不仅在武打处理和视觉效果的营造上不落窠臼，而且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突破传统，向西方文化提倡的强调自我、主体反抗精神靠拢。可见，“西进”武侠电影不仅要以外在之“象”吸引观众，而且不能忽略“形”的塑造与“神”的

传达。

在武侠电影的发展历史中，《卧虎藏龙》可谓武侠片制作由俗到雅的一次大胆尝试。武侠电影“西进”的成功关键在于对传统范式的突破和改造，李安以电影诠释了华语电影“西进”并非完全西化，而是要真正深入到情感价值观的共通点，探寻中西方艺术在表现人性上的相似之处，以电影为媒，实现中西文化在互动中的共生。

###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2. 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3. 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4. 宋婷婷：〈进入龙的世界：导演李安谈《卧虎藏龙》〉，《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5. 王度庐：《卧虎藏龙（上、下）》，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
6. Robert Arp, Adam Barkman, James McRae: *The Philosophy of Ang Lee*.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3.



##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来稿须知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是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范围涵盖一切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课题，学术领域不限。本刊格式：

1. 文稿一律采用中文简体，以 MS Word 编辑，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独段引言用“楷体”，采用 12 号字，1.5 倍行距，页码置于页尾右侧。

2. 文稿顺序：中英文篇名、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中文为先）、正文、参考文献。

3. 篇名：简明、确切地概括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不超过 20 字，必要时可以加副篇名。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英文篇名与中文篇名含义一致。

4. 作者简介：姓名、职称、工作单位、研究方向或者研究兴趣和邮箱。

5. 摘要：客观地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不超过 300 字，不分段，不用图表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或术语，不引用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要相对应。

6. 关键词：反映论文的主题概念，一般标注 3 - 8 个，用分号隔开。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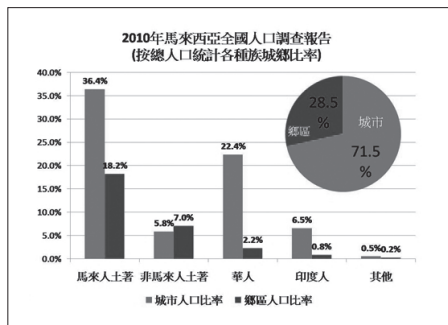
7. 标题：大小标题以一，（一），1，（1），（i）为序。

8. 脚注：是对引文出处或用于对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采用1序号，通篇序号连贯，若脚注针对文中某特定词语，序号置于该词语右上角，脚注内容位于插入页正文下方。体例如下：

1.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62页。
2.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年第111期，第103-113页。
3.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年，第9-19页。
4. Voltaire: *Candidate and Zadig*.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168.

9. 图表：文内所有的图表皆以序号标明及排列，如：图1、图2、表1、表2。序号后应备注该图表的相应标题（如有），资料来源置于图表的下方。如：

表1 2010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调查报告



资料来源：政府人口普查报告 / 作者制表

10. 参考文献：列于正文之后，中英文参考文献分开排列，中文在前，英文随后，采用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如：

1.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年。

2.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
3.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 年第 111 期。
4. Voltaire: *Candidate and Zadig*.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11. 网络资料：作者：〈资料名称〉，《网站刊物名称》，资料发表日期。网址。取用日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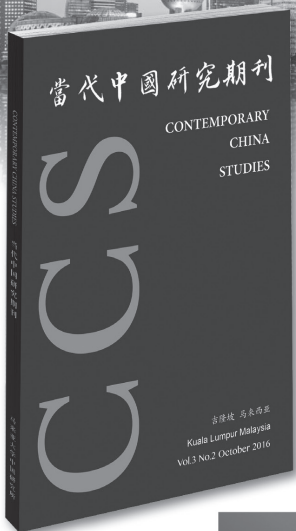
张铁：〈人民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网》，2011 年 12 月 22 日。网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6677909.html>。取用日期：2017 年 5 月 13 日。

12. 联系方式：包括能够与作者及时沟通的电子信箱和电话。

竭诚欢迎广大新老学者踊跃投稿。

**本刊编辑部电子信箱：**[ccs2014ics@gmail.com](mailto:ccs2014ics@gmail.com)

**地址：**《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ISSN 2289-7534)是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出版的两份学术刊物之一,也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本以中文为媒介语,深度剖析当代中国的学术期刊。

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和政府智库。本所成立于 2003 年,由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提议创办,旨在成为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从事中国研究的领军机构,并成为沟通全球关注中国的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的重要桥梁。中国研究所定期出版两份期刊:英文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为 Scopus 所收录;中文期刊就是本刊——《当代中国研究期刊》(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本刊自出版以来已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尤其在海外华人学术界。刊内所收录的文章内容广泛,涵盖与当代中国相关的各个领域,投稿学者来自东南亚、中国以及港澳台地区。本刊坚持以努力追求学术创新、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的理念选取当代热门的中国研究文章,并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出版,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本刊现向诸位学术同好邀约撰写稿件,任何与当代中国相关的论文课题,一概欢迎。本刊将继续努力成为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中文学术交流平台及展示中文学术文化的窗口。



**UNIVERSITY OF MALAY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邮箱: [ccs2014ics@gmail.com](mailto:ccs2014ics@gmail.com)

电话: 603-7967 7288

地址: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